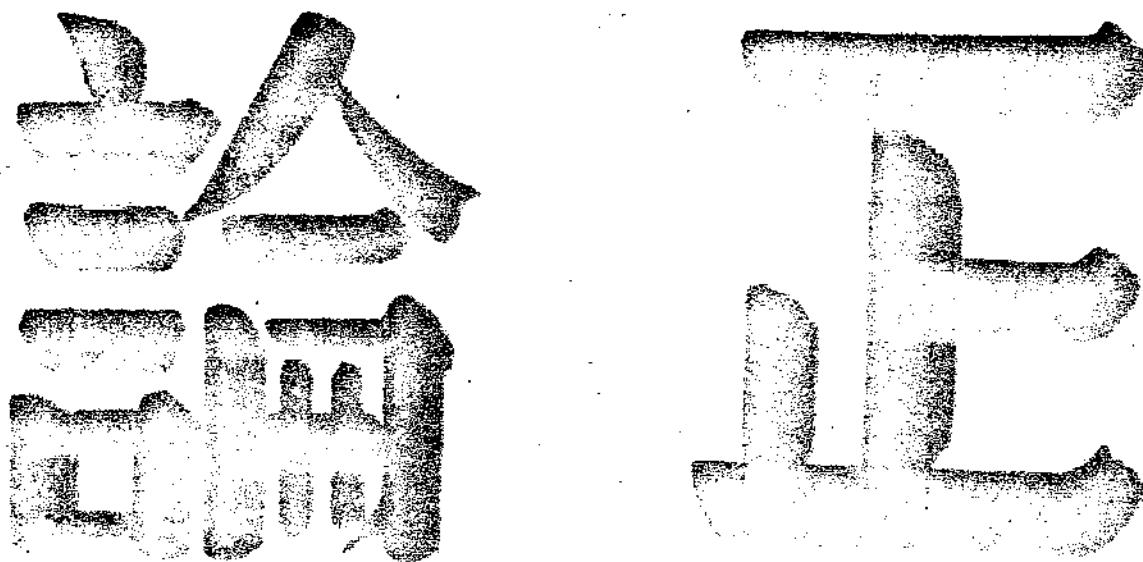


本刊內政部登記京警平字第七二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JUN 9 - 1948



新六月

新六月號

時評
對翁內閣的期望
陳立夫出洋
座談

立法院中的反對派
王鳳崗紅極一時

土地改革問題面面觀

趙迺搏 鄭伯彬 粟寄滄
胡寄牘 魏重慶 章友江
左宗倫 樊弘 陳壽琦

論著

土地改革是一個政治問題 陳壽琦

地方生存與地方財政

凌大挺

對美蘇結束冷戰的觀察

錢克新

反對不合理的扶植日本 張起鈞

通訊

門法運動戰 華北戰局 本刊特約記者

戡亂河北與王鳳崗 本刊特約記者

譯述

美國應有的外交政策

W. Lipman
華毅譯

對於蔣總統的期望

C.Y.W.
朱望之譯

版出日 一月六年七十三年民華中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民國三十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新六號

本期定價四萬元

訂接直閱

三個月三期十
六個月六期二十
平寄郵費在內
航掛三期暫收四
郵費加價，請予補繳

發行人 趙黎熙

正論

主編人 陳壽琦

張起鈞
黃季虹

社址 北平西四羅圈胡同五號

電話二局一八八一號

總經售處 中國文化服務社北平分社

西單北大街四十二號

電話二局四〇三一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對於翁內閣的期望

行憲後首任內閣揆，雖然是難產，畢竟分娩出來了，這真是值得慶賀的一樁大事。閣揆翁文灝先生，據說，「在黨內派系色彩不重」，「對於經濟建設功績卓著」，在這派系利益高於國家利益的風氣之下，經濟上搞得焦頭爛額的現在，全國人民對於翁氏實不寄與熱烈的期望。

翁氏是個學者，而且操守極好，這是大家一致承認的。抗戰時期他那重慶沙坪壩的簡樸「官邸」，遠不如北平普通的小四合房，公餘之暇，不僅看書而且寫文章，雖然是從政二十年的學者，仍然是書生本色。不過惟其因為是個學者，性情難免流於僻傲，做起官來，往往爲了看不慣種種現象，而對屬下大發脾氣，此次立法院開會有人說他官僚氣息太重，便是這個原因。雖然如此，翁氏仍不失爲一個「好人」，用他來組織「好人政府」是有希望的。

單從翁氏的「才」，「智」來說，担任內閣總理這一重頭角色，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作爲一個政治家，「才」，「智」兩個條件，并不能保證成功。更須要的是政治家縱橫捭闔的氣度，和經世濟民的偉略。翁氏似乎對於此點略有欠缺，雖然他從政近二十年，大家對他的印象，好像只是個有條理有辦法的謹慎小心的事務官，作爲一個內閣總理，多少有點缺陷。

我們希望翁氏對於此多所努力，在其對總統對立法院的關係上，要發揮出政治家的風度。

對於總統要能真正做到「責任內閣」地步

，不要事事請示，件件遵奉手諭辦理，應該會則留不合則去。在翁氏長行政院消息發表後，報載其「能够聽話」是被提任的條件。希望翁氏注意及此。行政院應對立法院負責，而立法院則對人民負責，其間關係是十分明白的。所以對於立法院要明白宣佈其政策，不必羅列高遠的空論，而要對當前實際的問題，拿出具體解決辦法。不要空頭支票，而要臨床的處方。宣佈的政策不能實現，即應負責，另讓高明。

當前的重大問題，一個是「戡亂」，一個是「物價」，如對於物價無辦法，勢將愈勘而愈亂；所以經濟問題，尤其重要。我們希望翁氏能够在經濟上能以拿出大刀闊斧的作風，向豪門官僚資本家開刀，同時澈底厲行爲農民打算的土地政策。改變政權的性質，使新政府真能够代表老百姓的利益。謬云，好的開始等於成功一半，希望翁氏把握時機，立刻採行革新政策，作一個轉捩乾坤的大政治家。我們希望翁氏成功，尤希望新政府成功。

立法院中的反對派

政黨政治的妙用，就在於反對黨的鞭策。

我們現在行憲却正缺乏這樣一員名符其實的反對黨。立法院相當一般國家的下院，在立法院中，只看到國民黨的天下，無論民青兩黨還鬧着選舉糾紛，縱令一部國民黨的立法委員真能退讓使民青兩黨的人士加入立法院，試問這

少數幾個無聲無臭的席次，又會引起什麼作用？

不料最近立法院中竟突然有以劉不同黃字論人等為中心的所謂「反對派」出現，並且這派的聲勢還不在小。只看傅斯年所得的票數，便是明証。這從國民黨黨內看，自然是一個不幸的現象，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來，却是一個民主自由的良好表現，他們雖也同隸於國民黨，但假如真能好好作下去，却正可盡到我們所缺乏的「反對黨」的效力。因此我們對於這一陣容的出現，表示欣慰。我們希望所謂「反對派」的諸君能好自為之，珍重自己的使命，發揮政治家的風度。在這行憲伊始時，造成良好的政治風氣，尤其要注意的，一定要養成一切對派「流為爭權奪利派等攻訐的集團。

陳立夫出洋

據傳陳立夫氏即將攜眷赴美參加在美格行之世界道德重整運動大會，今後將在美有一相當時期之居留。

在中國政界中，「出洋」往往就是「失意」的別名，陳氏當然也不能例外，此次陳氏出洋早在大家意料之中，陳氏二十年來一向為國民黨的最重要的負責人，在黨內勢力的雄厚，無人能出其右，而陳氏也以把握有黨內的控制力來自豪。不料這次選舉副總統，陳氏的控制力，竟然完全失敗。國民黨中央所支持的人未

能選出，而出來的却是中央所不歡喜的人選。這種失敗，負黨內責任的陳氏當然不能辭其咎。接着立法院中又通過同意權的把戲，更顯露出國民黨內的步驟不一致，換句話說也就更證明了黨的控制作用的失敗，陳氏據傳因此受到最高當局的不諒解，而其出洋的原因，就正來於此。

以陳氏在國民黨聲勢的雄厚，而今天竟落得出洋一走，陳氏若是有心人時，應該及時深切反省，陳氏的控制所以失敗，在我們看來，並非勢力不够，而是根本的作風問題。一般人象、認為陳氏一派多是善於技巧和運用的，不過運用，技巧只是通權達變的一時之計而已，根本的辦法還是有待於主義思想的領導。只有主義思想的領導才能糾合忠義熱情之士，才能得到革命犧牲的精神。至於運用和技巧則只能敷衍於一時，絕不收到精神團結的實效。

到必要關頭，深沉有城府的人自仍發揮其已的正義主張，投機而來的份子，則就唯利是圖了，誰還管團體利益，黨的紀律？不幸陳氏主持國民黨二十年來却正走的是這本末倒置以後一條路。所以到行憲需要發揮政黨效力時，便當堂出彩，百醜齊揚了。

陳氏若能虛心上進，應該乘此遭受打擊時，澈底反省一下過去的作風。而國民黨的中央也正應該乘此人事更選的機會，澈底改變過去的作法，而應該拿出主義思想來領導，然後國民黨才能新生，才有前途。

王 崑紅極一時

王鳳崗現在已成為全國矚目的紅極一時的人物了。在半年前王氏仍不過是河北省第十區一位平俗的專員。不料時勢造英雄，在全國各地對於共黨都望風披靡毫無辦法的時候，經過傳作義楚溪春的一擰，中央的再擰，這位王鳳崗的令名便不胫而走遍全國了。

王鳳崗確實是位苦幹肯幹有成績的人，值得大家稱讚敬佩。他的成就心得，也確值得大家採效與參考。但同時我們却不要忘了王氏原是一個平凡的人，而不是萬能的救星。他的一套辦法，也只是因地制宜的權宜之計而已，絕非高明合理的大道。當初傅楚對王的標榜，揣其用意，不過是賞一勸三，鼓勵羣倫而已。現在中央却把王氏電召到京，大有名當道無不移樽就教之勢，政大也請王氏講演，宋子文也邀到廣州晤談，甚至中央還特別電召豫魯當局來京向王氏領教。好似王氏就成為剿匪的專家一樣。這實在是把王氏估計過高，這種過份之舉，對於王氏非僅沒有好處，反而要把王氏毀掉。實非所以培植人才，篤實求治之道。再就另一方面說，中央這種過份的重視，也充分現露了張惶失措病急亂投醫的態度，因此也就無怪有「乞靈義和國」之譏了。

我們認為中央對於王氏的辦法應有公允的認識，合理的評價，在今天應該都勸法王鳳崗一個平凡的人，不要忘了他的辦法還有缺點存

土地改革問題面面觀

——本刊座談會紀錄

出席人 趙迺搏（北京大學教授） 魏重慶（南開大學教授） 粟寄滄（鐵道學院教授）
 鄭伯彬（中國大學教授） 胡寄牕（輔仁大學教授） 左宗綸（朝陽大學教授）
 樊弘（北京大學教授） 章友江（華北學院教授）

紀主 席 陳壽琦教授（本刊主編人）
 錄席 虞大寧 謝同

陳壽琦

最近土地改革問題，很為各方面所重視，朝野上下，都在熱烈地討論着這個問題，我們看到中國土地改革協會，所公佈的方案與社會經濟研討會所發表的主張，我們也看到政府綏靖會議，對於土地處理特別注意，與中共的土地法大案。現在把這幾個方案，擇要報告一下，供諸位先生討論的參考。第一是南京中國土地改革協會的方案，其基本主張如下：

甲、天然資源如山林，川澤，水力，礦產，及因社會進步而發生的土地利益，應一律收為公有，歸全體人民共同享受，不得為任何私人或私人集團所壟斷獨佔。

乙、農地（包括耕地，園地，牧草地）除國營或地方公營者外，應一律農有，以實現「耕者有其田」，澈底消滅地主階級及租佃制度。

丙、市地及重要經濟建設區內之土地以公有為原則，其新闢及衝要區域，應儘先收為公有，並勵行都市計劃，根絕地投機，使工商企業免受地租之壓迫，公共建設得合理之發展，並使一切市民有適於健康生活之住宅園地。

丁、全國農耕土地，應自即日起一律歸還現耕農民所有，所有佃農在十四年內交納現在租額七倍的實物給與地主，以清償地價。

從第一年起代替地主負擔地租，其租額不得超過土地正物產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地價償清後，佃農即取得土地所有權証。

第二是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所提出的主張，全國土地以全部收歸國有為最終目標，在施行的過程中規定私人農地的最高限度，超過者，收

歸國有。收歸國有時，給原來的地主以長期債券來補償，該會是主張「土地國有」的。

第三是中共於去年十月十日曾公佈「土地法大綱」，規定取消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取消鄉村中的一切高利貸的債務，中農所有的土地財產不動（當然這裏所說的中農是有他的標準的），地主所有的土地和財產，以及富農所有的土地和財產都由貧農和僱農按照人口來分配。地主和公務員現役軍人同樣的可以分得一份。鄉村農人和自由職業者，也可以根據其收入不足以維持全家生活之數，酌量分給土地，而且這種分配，除了土地本身之外，並包括，牲畜，農具，房屋，糧食及其他財產的平分。分配給人民的土地，由政府發給土地所有証，之後，並承認其自由經營買賣，及在特定條件下出租的權利。這些土地政策，完全由全鄉貧農僱農所組織的貧農團，以及農民大會及其選出的鄉區，省等級農會負責執行。

第四是山西省閻錫山所實行的兵農合一的辦法。規定「地主保有所有權，農民取得使用權，政府管理分配權」。一切耕地均交給政府管理分當兵。凡十八歲至四十七歲的壯丁平分使用。每六人分一組，二人耕田，四人種田，保障當兵人家屬生活及負擔其所應納之稅和按一定比率之地租。

第五是政府所公佈的綏靖區土地處理辦法，規定於綏靖區內的耕地，其所有人為自耕農者，得依原有証件收回自耕，其所有權人非自耕農時，在政府未依法處理前，准持憑證件，保留其所有權，併由現耕農繼續佃耕，但租額不得超過三分之一，收復前農民所欠繳之佃租一概免予追繳。如無法恢復原狀之土地，則由政府以土地債券徵收

後，給農民按價承領自耕。

以上五個方案，前兩個只是一部份人所提供的方案和意見而已，尚在獻策和討論的階段。第三個方案——中共的土地法大綱——和第四個方案——兵農合一方案——施行情形如何我們尚不知道。而第五個方案——綏靖區土地處理辦法——施行困難很多，以致只是名義上施行而實際上並未施行得澈底。

中國是農業國家，中國的社會也是農業經濟社會，所以土地問題在中國特別重要，所以也應特別注意。今天我們這個座談會，請各位儘量發表意見，昨天趙先生說應該有討論的題目，本人想到下面幾點，現在提請大家討論。

一、對於上述五個方案，我們應該批評其得失。

二、我們是主張「耕者有其田」的私有財產制度呢？還是主張「土地國有」的公有財產制度呢？抑或是由「耕者有其田」走到「土地國有」呢？

三、土地改革、是否應顧慮到地主階級的利益，而對其損失予以補償？還是乾脆予以無償沒收？

四、土地改革問題的提示，究竟與其他經濟政策如何配合？

五、土地改革問題已經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其在現階段，政治上，軍事上，所含的意義如何呢？我簡單的想到這五點，希望大家發表意見。

左宗綸

栗寄滄：就按陳先生所提的重點討論吧，如有另外的問題，隨時再加以補充，我提議請趙先生先發表意見。我們發言時，要注意到那幾點意見。我對土地改革這個問題，並不十分重視，且略微說一點意見。現在這題目的提出，所以能引起大部份人注視的原因，恐怕是由於中共提出了「土地法大綱」以後，希圖以此來爭取農民，所以國民政府也就不得不提出一個方案來應付和對抗。兩方都是以此為攻勢來鬭爭。中共提出這個方案是着重於軍事方面和政治方面。希圖以此來爭取農民，作為中共的政治資本，而國民政府所公佈的方案，多半是調門高，但是却行不出來。

不論是中共發表的方案，抑或是國民政府所公佈的方案，在他們的內容方面，都是偏重於地權的分配問題，也就是生產關係的問題。但是目前頂要緊的問題，不是生產關係問題而是生產力問題。土地改革如能增加生產力，則土地改革是有用的，因為唯有增加生產力之後，才可顧提高一般農民的生活水準，增加農民的福祉。但是，增加生產力這一個問題，却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做到的，它是須要慢慢的做去，也不是用革

命手段所能达到的。所以我們主張在土地改革的問題上，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他是須要兩方面同時並進的，一方面改革土地的分配問題，一方面更重要的却是提高生產力的問題。如果僅僅注重土地分配的一方面的問題，結果恐怕是政治的意義多而經濟的意義少。不過我最近很少得到中共方面的消息，不知道中共關於生產方面的材料，我覺得土地改革的分配問題，應在平靜的時候進行，目前我們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有比土地改革還重要的問題急需我們改革，如今你提出了一套方案，注意到土地的分配問題，我也提高了一套方案，也是注意到土地的分配問題，這分明含有一種政治的意味。

一說到土地問題，稍注意的人，馬上可以注意到地權。地權可分兩種，一種是土地的所有權，一種是土地生產品的所有權，所以談到土地改革，應從租佃關係來改革，也就是重新分配所有權？還是從土地本身來個根本改良，以圖增加土地的生產呢？這是需要研究討論的。而這兩個問題的解決，在如今的中國來說，一個需要革命的手段，一個需要緩和的，維持秩序的條件下去改良。陳先生剛剛說土地改革需要和其他的經濟政策相配合，這是很正確的。土地固然是財富的代表，其他物資更可以代表財富。所以，如欲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是應從其他方面來着手，例如，豪門，官僚資本的清算等等，是更能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

栗寄滄

對於趙先生的意見，我只贊成一部份，目前國民政府和中共兩方面所提出的土地改革，確實是政治的意義大於經濟的意義。原因是，在如今的內戰局面下，誰能改革土地，誰就能把握人民，誰能把握農民，誰就能獲得成功。國民黨執政到現在，已經二十年了，在這二十年當中，他始終沒有敢對土地加以改革，然而現在因為中共方面提出了這個土地法大綱，希望以此來爭取農民。國民政府被迫於此，不得不加以改革了，而共產黨之所以提出了這個問題，確也是政治的意義相當濃厚的。

根據中共「土地法大綱」第六條：「鄉村間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鄉村農會接收，連同鄉村中其他一切，按鄉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統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數量上抽多補少，質量上抽肥補瘠，使全鄉人民，均獲得同等的土地，並歸各人所有。」及第十一條：「分配給人民之土地，由政府發給土地所有証，並承認其自由經營買賣，及在特定條件下出租的權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約及債約一律繳銷。」從以上的自由買賣，經營，出租看來，根本就不算是土地改革的經濟平等的目的，而只是政治的手段而已，希望以此來爭取農民罷了。這是贊同趙先生意見的地方。

不同意於趙先生者是土地改革並不是次要問題，而是極重要的問題。我認為土地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不能也不應當拿高度文明國

家的經濟來衡量，估計中國，從歷史上看來，歷代的改朝換代，多半是由於農民們的暴動，而農民們的暴動又是由於土地分配以不平所致。因此今天大家來談土地改革是很重要的，也是很迫切的問題。同時，趙先生認為：土地改革應着重於生產力，而不應注重生產關係。然而我認為，這兩種是必須相互配合的，在生產關係未能正當確立之前，生產力是很要受很大影響的，事實上，必須有正當的生產關係，才能發揮出好的生產力，如果生產關係不合理，生產力是不能有進展的。例如有的地方，生產關係非常不合理，貧農的生活都無法維持，所以農民就沒有力量來儘量生產，又因為租佃關係利益分配得不公平，地主既不願意出資從事增加生產，同時，農民也不甘提高生產後使地主平白的增加其收入，所以，也沒有興趣來改革。

在方案方面，我覺得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是最對的。關於平均地權我的解釋和別人稍有不同。我認為地權也就是土地所生出的權益，平均地權，也就是平均土地所生的權益，使人民有平等享受的機會。最後的理想，當然是土地國有，不一步達到，故第一步是必須耕者，有田可耕，耕者有田可耕解釋，第一是耕者有田可耕，第二是耕者有充分的田可耕。因為耕者僅有田可耕還是不能達到農民們的幸福要求的，雖然地權絕對平均，但是田地不够還是不成的。根據金陵大學伯克教授的統計，中國土地的可耕地為七億。六百萬畝，已耕地為一億七千六百萬畝，可耕而未耕地是五億三千萬畝，已耕地是未耕地的三分之一。如果，我們認為他的估計太高，給他打一個對拆，可耕而未耕的土地尚有二億六千五百萬畝的增加。即說把已耕地與可耕未耕田全部平均分配給農民，農民所得到的田也有限。為使耕者有其充分的田，我們必須移民拓荒。這些技術問題，我們不予討論。而其第二步雖是耕者有其耕作之田。也就是說，實際耕種權與土地所有權統一，取消租佃關係，除去剝削制度的存在。但是如何去做呢？如何去掉租佃關係，如何使耕者有其田呢？有激烈的方法，有緩和的方法。激烈的方法，如沒收地主的土地，而不給予任何的代價，即是踢去地主。緩和的方法，如徵收土地稅，稅去地主，或給予地主以相當代價，而買去地主的土地，激烈的方法，共產黨在鄉村已經用過，如鬥爭，清算等是，這方法。有好一段網羅處，有壞處，有利益也有障礙。甚至有些地方行不通，所以還是一土地法大綱。最好一點。都市的土地應徵以重稅，孫先生的照價收稅照價徵收是很好的辦法。目前由佃農分年購買土地辦法，是正確的，但購買年應務求其短，而且買價要低，購買年應最多五年，而不能七年。地價償還年限，務求其長，最好是十年以上。不要太顧及地主的利益，大凡地主所擁有的土地越多，則他的地價將越低。而農民購買土地，其所有權應從付款的第一

年起，不應從地價償清以後算。農民取得所有權以後，不可自由買賣，抵押，出租。因為如果允許其自由買賣，抵押，出租，將來總有一天地權重行集中，所以我在這一點上對於中共的「土地法大綱」有點兒太不懂了。所以我想他完全是政治作用，同時對其以往的主張，打的折扣太大了。

趙迺搏 所以在這一點上，他是矛盾的。

章友江

關於「土地國有」在理論上講不是社會主義的口號，而是資本主義的口號。在中國，土地是應當國有的，中國共產黨

沒有提出這口號有人說「共產黨是政治作用」。我覺得這要看如何了解它。不論那個政黨對政治經濟都必須有適當的考慮，而提出了一個改革的要求，我們不能說這要求，便是政治手段。如果，一個政黨假如僅以土地改革做為政治手段，則其對改革也必不忠實。土地改革本身雖屬於經濟性質的，但是他並不能超現實。事實上，經濟上的考慮是必須配合軍事和政治的，然而我們却不能說他是政治的或軍事的考慮。故而我們應當了解清楚，這「土地改革」究竟是經濟的，抑或是政治的軍事的，粟先生所提出的「中共的土地改革」准許自由經營，買賣，出租，為奇怪。雖然中共土地法大綱，我沒看見過，但是我想這并不出奇，因為土地改革之後，這和緩並不是一個矛盾。

事實上，東歐各國已經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並且共產黨處於領導的地位，其政策當是很徹底的，很激烈的，但是他們並不是這樣，而是非常落後的，仍允許農民拿錢給地主。第一次歐洲大戰以後，共產黨批評社會人民黨是落後的，而如今共產黨獲得政權之後，他們却緩和了，所以其改革情形如何，尚須顧及政治環境，所以這全看其政權得失為準據。

鄭伯彬

他們鑑到生產力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此舉不只是顧及到生產關係。他們打算，由這方法走到集中農場，由小農經濟走向大農經濟，

利用自由買賣做為必經的步驟。一般人的疑問是「為什麼一件事，需要分成二回或三回來作呢？」關於這點我想是很容易解答的，因為「土地改革」是比工業或其他改革更麻煩的。以蘇聯來說；土地國有生出了很多的麻煩，因為農民比較其他職業的人民，更趨於保守，所以中共想緩一步去作，以期省去很多的麻煩。這就是說，一方面解決生產關係的問題，一方面來發展生產力。

胡寄臘

我平常對土地改革的問題不很重視，我和趙迺搏先生的意見差不多，認為如今國共雙方提出的土地改革，政治的意義

正論

，確高於經濟的。而如今的情形土地問題遠不如一般想像得嚴重。第一，大家注意到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分配不公平，因為土地分配情況不均，所以生產不能發達究竟到什麼程度呢？因為我們缺乏材料，很難說明。以北平的土地來講吧（北平是在各方面都是可以代表中國的地方）北平的土地所有權人是四〇四二八人其中法人是一四〇七人自然人是三九〇二人在這些所有權人擁有百畝以上，只有二人，擁有七十畝以上的，只有四人，擁有五十畝以上的人只有八人，一畝以上的有七三九〇人，一畝以下的人數却在三三〇六九人（其中包括三分以下的地主一萬四千多人）由此可見，一般人都對土地問題，沒加以細分，如果是細分的話，則土地問題却不得不為一般想像得那麼重要。

左宗綸，你這個資料，只能代表都市的土地分配吧？

胡寄臘 第二，拿中國的現時情形說，即或土地是集中的也不是歷史上所說的土地集中，在歷史上看來，土地集中的時候，普通要土地的人，沒有方法而且沒有機會得到土地。而如今能夠隨時得到土地，要買土地的人，隨時都有買的機會，則此問題，即不為嚴重。

第三，中國的家族制度，是特別的，和西洋的家族制度不同雖然，有的時候土地是會集中的。但是由於中國的繼承制度，集中以後，不久就要分散的，再者子女多，分散到每人手裏以後，每人所得的數目就不少了，所以中國很少有百世之家保有偌大的土地。因此土地隨時集中，隨時分散，又可知中國土地問題並不十分嚴重。土地問題的提出在西洋不過是十九世紀的產物而已。二十世紀此問題所以仍然存在，不過是十九世紀的因襲而已，我覺到自耕農對土地國有並不是最後的理想。因為土地國有並不能使從事生產的人感到興趣因為土地國有和國家為全體人民所有一樣，那一個老百姓對國家的公有，在平時感到多大興趣呢？總之，土地能改革更好，不能改革也無所謂，耕者有其田是對的，假如每個人即或有田可耕，然而所得的單位太少，還是不足以維持生活的。

附帶對於中共的「土地法大綱」的准許自由買賣，經營，出租加以一點意見來解釋，我覺得，土地之准許自由買賣，經營，和出租是當然的。因為人口要移動的，要轉業的，如果，不許人口轉業或是不許人口移動，豈不成了封建制度？所以必須允許人民對土地自由買賣。但是買賣不應超過一定的限度的。

左宗綸，我對於胡先生所解釋的關於土地允許自由買賣一節，非常贊同。

必談。目前耕者有其田，完全是白費的，因為沒有人去執行的。我覺得，一切政治都是有階級性的。只有代表農民利益的人才能實行土地改革，如第三者來談改革，根本就是廢話。所以必須教育農民，組織農民，使農民自己去作才成。

左宗綸：在中國的現狀下，中國的憲法是根據三民主義原則下產生出來的，三民主義裡面是主張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是私有財產制度，土地國有是公有財產制度。公有財產制度，在如今的政治下，是否與憲法抵觸？

耕者有其田，也就是不耕者不能有田。那就是把中國現在有的土地拿來分配，其方式是沒收呢？抑或是有償收買來分配？現在地主們對農民剝削，所以要改善租佃的關係。但是即或是把全國的土地重行分配究竟能不能解決問題呢？於是我們必須先明瞭一個問題「中國的佃農究竟有多少呢？」有人說「只不過是百分之二十」如果改善了這百分之二十的租佃關係，是否能解救農村危機。地主固然是剝削階級，而現在對一般人民剝削得更利害的却是豪門資本。如只討論改革和佃關係而不涉及豪門資本，即或是鄉下的地主問題解決了，都市的豪門大亨依然作祟，問題還是不顧解決，這雖是兩個問題，但是却不能不合一起來討論。

所謂耕者有其田，是否土地的所有權歸於耕者，為欲土地國有就不能不修改民法了，因為土地的所有權是國家，佔有權是屬於耕者的。去年的上海某個報紙上的社論會批評中共的「土地法大綱」，大意說：「中共的這一套非常好，國民政府也應當提一套來對抗。」由此以觀，土地改革到現在顯然已經變了質，他已經偏重於政治了。所以真正的土地改革是很難實行的，何況如此改革又不能增加生產救濟農業呢？加以中國雖有地主存在，但是並不是資本主義的地主。所以我很同意胡先生的說法。

胡寄臘：不過剝削關係的問題也是很重要的。

左宗綸：拿中國的地主來說：其山來，第一是做官的發了財，回家買地。第二是做買賣賺了錢，回家買地。家裡做官買地的人家，根本不知道他自己的土地在什麼地方，而且也不會經營。到了後代逐漸消失，而成了買土地的人的對象，所以他們的地權是不會長久的，差不多隔不了兩代，土地就要完全出手。同時，拿我的家鄉來說，擁有一千畝地的地主，就沒有一個。所以我認為中國第一沒有封建地主能够長久保持其土地。第三又沒有大地土存在。抗戰以來，後方雖有一批新地主出現，但是他們也是不懂得經營的。所以我的結論是中國的土地分配問題並不嚴重而應當馬上着手，移民，開荒來擴張中國耕地面積。

趙迺搏：往遠處看，可耕而未耕的土地太多了，而已耕地的人口又太密了。所以我覺得平均地權以後或是土地改革以後，根

本就不能解決耕者有其田的最後的民生問題。再加以耕種方法不進步又能提高生活水準呢？

左宗綸

我認為耕地應再加利用使土地沒有荒廢，沒有浪費。

魏重慶

土地改革，講起來，大別有二：一為耕者有其田，一為平均地權。平均地權也就是土地國有，是必須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作到的，就中國的現狀來講，完全是一種理想。耕者有其田的辦法很多，依我想，所有權應當歸地，耕作權應當歸耕戶，分配應當歸政府。

其他與土地有關的租稅或其他支出，都由地主來担负，如此一來，地主就不會在土地上得到甚麼不合理的地租收入，於是地主也就不會對土地發生太大的興趣。由於地租低，地價也就不會太貴，佃耕改為自耕農也就比較容易得多。另外，政府如再於鄉村組織金融合作社，消費合作社，生產合作社，運輸合作社等，合作事業，則農民就能減少支出，

土地改革是一個政治問題

陳壽琦

一 土 地 改 革 能 否 成 功，要 看 政 權 性 質 如 何！

土地改革問題，現在已到了非予解決不可的地步。中共拿土地改革為爭取農民的法寶，而中共也一再注意到綏靖區土地處理的問題，好像誰能解決土地問題誰便能統治中國似的。本來，中國的人口農民佔百分之七十以上，土地問題的比重自然特別來得大；何況目前的兵源與財源都與土地有不可分的關係；所以大家都特別注意土地問題，勿寧是當然的事。

土地問題本來是中國幾千年的老問題，但却始終沒有得到解決。孫中山先生最初組黨的時候，便提出平均地權的主張，國民黨執政二十年却在土地問題上完全交了白卷，到現在又被迫從頭做起。中共一向以土地革命為號召，不惜用清算鬥爭的方法來革地主的命，多年來實行的結果，也遇到很大的阻力，而不得不一變再變，土地的生產關係雖改變了農產力反而遭到破壞。總而言之，目前生活在政府控制區與非控制區的農民，生活水準都未能因而提高，土地改革究竟給他們帶來多少利益是頗有問題的。

土地改革也好，土地革命也好，目的都在提高農民生活水準。這所說的農民包括僱農，佃農與自耕農。尤其僱農與佃農在現有的土地關係下，是處於被剝削的地位，此種被剝削的關係必須解除，因為只有解除此種被剝削的關係，農民的生活水準才能夠提高，或才能有提高的。

可能。這種被剝削的關係一方面表現在地主的佃農的租佃關係以及地主與僱農的關係上，一方面表現在豪紳與佃農僱農的高利貸關係上。所以目前土地改革的要求，必須澈底廢除租佃與僱傭關係。必須取消一切高利貸，至於實行的方法，不問是用溫和的，還是用激烈的，其目標應該是一樣的。

國民黨過去是用溫和的方法來實行土地改革的，即是為達到民生主義上平均地權，用照價收稅與照價收買兩種方法來消滅地主。假如能認真實行，應該會多少有點成績。甚至土地反而更形集中，農民負擔愈益加重，事實上，國民黨人並未能平均了一畝半畝地權。國民黨執政，二十年為什麼竟弄得這樣太不成話的狀態呢？這與政府本質有關。關於此，南京中央週刊召集的土地問題座談會上，有許多坦白而誠真的意見發表：「政府施政要經過立法程序，要通過行政機構，各級民意機構的代表們大多與地主階級有瓜葛，各級行政機構的主管人員也往往是地主階級，對於推行土地政策，常常發生意外挫折」。「我們黨和政府的土地政策一到鄉村去，就被少數人操縱，若干富人只知道升官發財，發了財便兼併土地，變成新興的地主階級」。「把土地問題的解決，寄託於他們的身上，甯非緣木求魚？」土地改革原來是與地主階級利益衝突的，

增加收入，如此也就能够提高農民的生活水準和幸福。假如政府再能和統制經濟配合起來，農民就更能安定，於是農民既然生活能得保障，而且生活水準，也能提高，自然農民的生產力就能提高了。如果政府能以全力予以農村以支援，則中國的土地問題，經濟問題很容易的就連帶的解決了許多，至於土地的量的問題，已耕地是不足的，應另向可耕而未耕地開荒移民來解決，至於做的方面，否做得到，是否做得好，則全看政府或主持人是否有決心來決定了。

左宗綸

總之，施行的人，是否有決心，是土地改革的關鍵。所以政治方面的條件非常重要。

陳壽琦

（今天承諸位先生熱烈發表高見，本人謹代表正論雜誌社向諸位先生道謝。）

假如執行土地改革的人本身便是地主階級，那一定是掛羊頭賣狗肉，土地越改革，地主階級利益越增大，而一般農民負擔反而愈益加重了。

地主階級天然地不能够改革土地，但爲了怕被人家改革掉了，都可以來一套辦法加以掩護，徵收地價稅或照價收買，既然是達到平均地權的方法，但徵稅「必須先辦地價估定，要估定地價，又必須先辦土地陳報與土地測量」。「中國面積太大了，土地測量實在是一個鉅大的工作，據估計全國農田約有二十萬萬畝，而推行了二十年的土地測量，現在只測量到一萬萬畝」，這套辦法手續自然是言之成理的，可是照這樣進度辦下去，不知那年那月才能把土地測量清楚，耕者有其田更不知那年那月了，最低是兩三代以後的事，與目前活着的人是無關的。至於照價收買，現在更是說不到，政府天天在計劃出賣國營資產，又那有能力來收買呢？

講到這裏，我們可以指出土地改革是一個政治問題，政權問題了。

只有不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政府才能够實行土地改革。而我們過去政府却不具備這個條件。抗戰勝利後首先所採用的是豁免田賦一年，不是充分表現出爲地主利益着想嗎？後來被各方指摘，雖然不得不也宣佈實行二五減畝，可是除掉有幾個傻小子爲此被地主殺害以外，試問何農何曾得到絲毫的減租的實惠？還不是一句空話？所以目前要實行土地改革必須政治上有大改革，行憲後的新政府必須不再爲地主階級利益打算，而能處於農民利益着想。假如行憲後的中央與地方政府還直接間接爲地主或地主代表人所控制，任何的美麗的方案計劃，都不過是空中樓閣，自欺欺人的把戲罷了。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問題。

至於土地改革的方法，我們是贊成溫和的方法的，不必用武力來踢去地主，雖然不必爲地主利益打算，但地主也是人，也要供他們有生活之道。地主是社會制度的產物，大可不必把他們當作私人仇恨的對象。對於若于大地主，不在地主，即使沒收他們的土地，生活並不會受到影響，不給任何補償，也無關係。但對於那些勤勞所得的小地主，在沒有適當方法供他們轉業以前，則應予以相當的補償。並且地主如願自己耕種也應分得其應分的土地。目前只應以耕者有其田爲目標，不必好高騖遠而立行土地國有，農民對於土地的愛着心目前仍是非常濃厚的。正可利用這種心理使他們增加生產，改善生活。也許有些人顧慮中國土地平均分配後，每人所得土地有限，生產關係雖然改變了，生產力並不隨有多大的改變，不能算是真正的土地改革。但凡事并非一蹴而幾，耕者有其田後，可以逐漸辦理合作農場，實行農業機械化。生產關係改變後，生產力然後才有增進的可能，改變生產關係總比不改變的好，假如非農業機械化可能時，再改變生產關係，又不知到那年那月了。目前中國工業尚不能完全機械化，農業機械化談何容易。只要生產關係改變後，農民的收穫，不爲不勞而獲的地主階級所消費，農民自可增加其消費，改進其生產，對於農村是絕對有益的。土地國有固然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理想，但必須經過耕者有其田這個階段來達到。我理想的步驟是這樣：耕者有其田——合作農場——土地國有。

還有土地政策必須與其他經濟政策有實切的配合，而且全國普遍實行，不能僅在綏靖區實行。土地固然是財產。其他生產要素也同樣是財產，地主固然應該交出他們不事耕耘的土地，資本家也不逍遙法外。大規模工業要收歸國營，官僚豪門資本也應予以清算，否則何薄於地主，而又何厚於資本家。政府目前像化緣似地用救濟特捐方法請豪門解囊，簡直是敷衍了事，毫無決心。行憲後如不能與豪門絕緣，則一切都是無救的。

地方生存與地方財政

凌大斑

此次國民代表大會中，區域代表對地方問題相當重視，對地方人民生存的要求，特別強調。關於這種現象，我們並不僅僅認爲是北方人民對於政府中人事上籍貫問題的不滿所引起的，實際上有產生這種要求的

政治環境。因此，我們不認爲這種要求含有封建的意味。反之，地方人民對於地方生存上的要求，正是民主政治的基礎。
民主政治與專制獨裁最現實的區別，是民主政治的力量是從下而上的（上下這兩個字誠然有語病，但是爲了習慣，還是採用它），而專制

獨裁政治是從上而下的。

若求民主政治的健全，須要先健全地方自治，地方自治能否健全，就要看地方財政之是否充足。財政是庶政之母，地方上辦選舉，辦教育，辦公共衛生，辦救濟與福利事業，處處需要錢，倘若連辦這些事的錢都無法籌措，要向上級政府去通融，那麼地方的自治政府，便不成爲自治，又成了上級政府的下級細胞組織了，試問這樣的民主政治的精神從何說起？

二

現在行憲已然半年，而我們憲政時期的地方財政是什麼情形呢？我們從收入方面來分析：

(甲) 支出方面：現行的中央地方財政支出分劃標準，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六日財政部召開的實施改訂財政收支系統會議所通過的方案，照該項方案，要點有三：(財政收支系統法第十三章第三十七條至第四十一條)

(一) 各級政府區域內人民行使政權的費用，由各級政府負擔。

(二) 國防外交的費用，與中央在地方行政司法權考試權監察權所需的費用由中央政府負擔。

(三) 凡關於教育，文化，經濟，建設，衛生，治療，社會救濟及移殖等支出，凡有全國一致之性質，或爲一省或院轄市資力所不能發展或興辦者歸中央。其有全省一致之性質或爲一縣市局資力所不能發展或興辦者歸省。凡有因地制宜之性質或爲一縣市局資力所能發展或興辦者歸縣市局。

依照以上的分割的標準，并不十分清楚，所以便造成了一個區域裡有國立博物院，又有市立博物館，有國立圖書館，也有市立圖書館，甚至於同一地點醫院也分國立省市立，就事業與經濟上着想，固屬滑稽的而必然發生的毛病。是凡事業之體生利者，中央與地方政府必爭，凡事業之純消耗者，中央與地方政府必拒。中央是上級機關，命令決定一切。地方政府難免佔了下風。

(乙) 收入方面：現行制度，仍重中央而輕地方，就大宗收入的課稅言，其分劃如下：

(一) 中央稅包括：所得稅，遺產稅，印花稅，特種營業稅，關稅，鹽稅，礦稅，營業稅(在院轄市收入中最少佔百分之三十)，土地稅(在省縣局總收入中佔百分

之三十，院轄市收入中佔百分之四十)。

(二) 省縣稅包括：營業稅(總收入百分之五十自留，分給縣市局百分之五，餘解中央)，土地稅(總收入百分之二十自留)。

(三) 院轄市稅包括：營業稅(總收入百分之七十)，土地稅(總收入百分之六十)，契稅，遺產稅(中央分給百分之十五)，土地改良物稅，屠宰稅，營業牌照稅，使用牌照稅，筵席及娛樂稅。

(四) 縣市(省轄市)局稅包括：營業稅(省分給百分之五)，土地稅(總收入百分之五十)，契稅，遺產稅(中央分給百分之三十)，土地改良物稅，屠宰稅，營業牌照稅，業牌照稅，使用牌照稅，筵席及娛樂稅。

由上所述，可知所有全國性的大宗課稅，幾盡爲中央所獨佔，而況中央除了稅收之外，還有非稅性的收入，如各種行政收入和大宗的國營企業收入呢？

照上面的分析，地方財政，一方面在支出上佔了下風，中央盡量把不生產的機關分歸地方，把有生產的機關自己掌握着。同時在收入方面中央留着主要的財源，省市收入少得可憐，比戰前差的太多，所以勝利以來各省市全都無法使收支平衡。即以未受內戰破壞和財富中心的重慶與上海兩市而論，重慶市三十六年度全年預算收入是六〇億，支出是二六〇億，不足的二〇〇億須中央去補助。上海市三十五年上半年預算第一四〇億支出要二〇七億，不足的六十七億，也要向中央乞憐。重慶與上海尙且如此，其他市可知。院轄市有如此多的收入尙且如此，其他省更可知了。

省市財政依賴着中央的補助，在訓政時期本無不可，不過到了憲政時期，便很難適合了。第一，行憲後的地方政府除了對上級政府負責外，還要對該區域的人民負責。最先該級政府的預算，須經過該區參議會的審核通過，照現在的情形，地方財政的收入與支出相差如此之遠(大約平津兩市的總收入祇佔到總支出的四分之一弱，河北省恐怕還不到這個比例)這樣預算如何能提到參議會去？第二，行憲後的人民，對政府的設施，有監督與審查的權責，當然人民對政府免不了責備與希望，照現在的情形，地方政府唯一不替人民作事的理由就是沒有錢。人民對於一個沒有錢的地方政府又有什麼方法能叫它多做事呢？第三，行憲後各級政府權限想訂清楚，地方要作事而無錢，中央有錢又不能像現在似的在各地方設些中央機關來越俎代庖。縱然設了中央的派遣機關，地方參

正論：「也不像控制地方行政機關那樣便利，必致於流入北平市參議會對國營事業漲價抗交運動那樣虎頭蛇尾的結果。」

四

為了民主政治之推行，地方財政實在有即日改善，達到收支平衡，實現健全財政之必要。不僅財政問題須要改革，地方人士在國大裡為地方生存的要求一點更不可漠視。即以華北情形而論，目前已到嚴重階段。

對美蘇結束冷戰的觀察

錢克新

(一)

戰後兩年多的歷史，使世界上每個角落認識了美蘇間的矛盾，很可能發展成爲一種新的戰爭。可是一個戰爭的爆發，其必要的條件乃是侵略者的存在。拿二次大戰發生的情形來看，納粹與日本軍閥征服世界的理想，就是她們走上侵略途徑的唯一原動力。所以，除非現在美蘇二國都有了這樣的理想，縱然對國際的政治和經濟問題互存異見，仍不難於誠意恢復的時候，獲取和平的解決。美國的名政論家李普門先生，在年初所出版的一本小冊子「冷戰：對美國外交政策的研究」中，即曾主張以解決的辦法來代替過去對蘇的抑止政策。毫無疑義地，李氏這個新見解，乃是直接改正了馬歇爾的外交參謀凱南在去年七月用「X」先生筆名發表於外交季刊的意見。他對於馬歇爾的歐洲復原計劃，認爲不該是杜魯門主義的適用，而應當採用美國過去的傳統，對於她本國不能單獨解決的糾紛，絕不捲入其漩渦。

凱南的機謀，固然現在已使美國考慮實施一種所謂「X工作方案」，可是李普門的新觀點，由於輿論的推動，也很可能使美國現時的外交政策逐漸變形。譬如馬歇爾在本年二月十三日向華萊斯故鄉伊阿華州「德麻恩」城全國農業研究所作的演講中，就提到美蘇關係的真正解決，必先有決定性世局改變的話。同時，我們如不健忘，當知在馬卿那次演講後數天，瑞士京城馬上傳出一個驚人的消息，報道美蘇當局已在華府開始會談，商討兩國間久懸未決的各項問題。當時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便是在那種謠傳中透露出雙方互相讓步的條件，例如美方準備允許蘇聯在北韓及中國東北自由活動，而以蘇聯承認在希臘停止援助馬爾柯斯，並減少德義共黨活動作交換。就是在美國本年度預算提出於衆院撥

款委員會的時候，馬卿也坦白承認：美國如能消除蘇聯方面的猜疑，則對兩國關係的改善，將有最大的幫助。美國外交政策如此在暗中所作的變形，曾經遇到許多極端派的惶慮，譬如前任國務卿貝爾納斯，就在三月十三日於北卡羅立那的「查理斯頓」城發表一個激烈的演說，要求對蘇採取斷然的態度，尤其對四月義大利的大選預作神經過敏的推測，可是貝氏此一演講，並未博取美國議員們的贊助，甚至共和黨的衆議員們還指出其戰爭歇斯底里的意味。

美國的對蘇政策，今春開始變化，其真正的原因，不外有三：（一）史達林在一年之前，就向美國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之一史塔森說明了兩國和平合作的可能，對於美國的人民和輿論界會引起相當的衝動，如果杜魯門想戀棧的話，他自然不得不把過去的政策重加考慮，（二）英美法三外長對德的倫敦會議，並沒有獲取顯著的成功，不僅擋置了西德建立政府的行動，而且也影響了三國在春間再度集議洽商制止蘇聯政策的可能性（美國務院曾於三月二十一日正式否認爲上述目的而召開三外長華府會議）；（三）馬歇爾計劃的推進，如須顧到東西歐間經濟交流的需要，美蘇冷戰熱化將爲最大的不幸。蓋以過去事實爲証，儘管蘇聯及東歐國家未曾參加歐洲的經濟合作，但東西歐間一方輸助食糧，木材、燃料，皮革以及錳銘等戰略資源，一方供以機器，交通器材以及金屬與化學用品，實爲天然不可抹殺的經濟互惠條件。所以在美蘇冷戰的後面，去年一年之中，西歐各國還是同東歐輸助了價值十億美元的商品，其中將近半數（四千三百十萬美元）更是美國對蘇的輸助；而東歐對西歐的輸出亦達八億美元。在這裏，我們不能忽視兩點事實：一方面蘇聯交通器材的缺乏，影響了運輸的復原，因此延誤了戰後五年計劃的預定計劃，另一方面美國受冷戰熱化的影響，使其對錳，銘，鉑，鎳等爲自定

身缺乏而必要內戰略資源，於去歲十月實施輸出管制後，逐漸減少自蘇聯的輸入，而延誤其六年儲積戰略資源的計劃。基於這些理由，我們相信美蘇雙方如何結束冷戰，在推行杜魯門主義一年的經驗中該是一個應有的覺悟。

(二一)

蘇聯因戰爭所導致的慘重破壞，誰也能够明白她的經濟復原如無美國的協助將延誤其實際成功的時間。當然為其戰後政治的見地所阻塞的美蘇合作，如無打開的可能，乃是一個極大的不智。即使在美國實施杜魯門主義之後，迫着她對東歐諸國以莫洛托夫計劃來對抗，且隨着冷戰加深而於今春結成了一個互助的防禦網，但對美不惜以全力獲取和平，乃是極為顯然的事。我們為便利於讀者的明瞭起見，可以拿下列數點來說明：

(一) 蘇聯戰後的外交政策是以打破世界經濟獨佔為經，取消民族不平等為緯，自然以維持和平並保全聯合國為其上策。所謂打破經濟的獨佔，其現實的方法就是國際間易貨的制度，譬如東西歐的貿易就因了這個制度，不至使西歐各國感到美元缺乏，形成被國際資本剝削的可能。(二) 蘇聯隨着本年新歲之始，對美更選使節，新大使潘友新抵美之後，即開始和平的活動，促進美蘇的邦交。(即在潘氏赴任之前，一向為美蘇國交之阻礙的清理租借法案的談判，也在去歲十二月十六日由蘇方向華府建議重行開始，且於今春歸還美船八艘)。潘氏在今春二月二十五日，首次接見記者時，重提去歲史達林與史塔森的談話，指明二國經濟制度縱然不同，戰時既可合作，平時當不至相反。因此他要求美方取消出口管制，俾發展美蘇貿易而達到兩國之友好。(三) 在本年之德境蘇佔領區報紙「愛米迪克」禁止發行。(四) 史達林於簽訂蘇芬條約之後，於本年四月七日，更以去年對史塔森的談話為據，表示國際之間之猜忌，經久努力自可消釋，且實美蘇芬條約為一大國對小國首次所簽的公正平等條約。

所以，美蘇兩國都不願戰爭，對於一個研究國際現狀的人，應該覺得是一個極為自然的事。遠在本年一月之初，潘友新大使抵美赴任，當時即傳會對史達林與美總統直接晤談之舉提出建議，因此還有些人在研究着，是否可能重開波茨坦三巨頭會議。但此項倫敦外長會議失敗後，推乾轉坤的建議，終因杜魯門不願輕離美土，而史達林亦不願赴美，並反對英國參與談判，以致未能成為事實。可是經過了二月間美蘇談判的謠傳，敏感的英國工黨議員多人，又在下面聯名建議，希望舉行英美法三巨頭會議，俾東西歐間成立暫時協定。甚至如美國衆院議長馬丁，在

杜魯門拒絕此項會議在歐召開(當時有人建議在瑞典京城)之後，更於四月十七日，力疾聲呼，表示他願與史達林晤談，並終止向戰爭之瘋狂前進，撲滅形將摧毀文明的烈火。

這個美蘇「和談之謠」，直到本年五月上旬之末，因了莫斯科廣播所傳，美駐蘇大使史密斯中將於五月四日奉命訪晤蘇外長莫洛托夫，面遞照會一件，建議兩國舉行談判，解決當前之國際難題與兩國間分歧的意見後，乃完全揭穿。同一廣播，說明蘇外長莫洛托夫，對此照會僅考慮了五天，即行答覆表示同意，以談判方式解決雙方之爭執。這樣地畫時代的迅速行動，証實了雙方半年來對祛除相互猜疑的努力，已獲有首一實際的結果，當然這必然也是由長時間舉行的秘密談判所產生的後果。無怪美參議員藍傑早在三月初就向國會建議，美國不得履行國際的祕密協定，這就是因為他擔心到是否如雅爾達的故事，將會向歐洲演出的緣故。

(二二)

自從美蘇換文之後，儘管世間的評論贊成的也好，譏罵的也好，至少可以描出了美蘇妥協的最初門徑。這個妥協的可能，在美國致蘇的照會中說得太清楚了：「美國制訂其政策時，會抱定一項原則，即如蘇聯願與其鄰邦和平共處，停止其直接間接干涉他國事務之企圖，則美國之政策，不能對蘇聯之利益有任何不良影響。質言之，如各國共黨少數份子，不威脅其本國政府，且不企圖建立其効忠外國之政權，則美國可不必予各國以援助，以維護其政治完整。因此，目前召致蘇聯報紙激烈攻擊之美國政策，其中多項皆可刪除」。在這一段話中，可以加以重視的，便是美國今已至少承認蘇聯是可以改變其政策的，要不然美國說出這樣的話，豈非是僞子？

可是在莫洛托夫的覆照中，曾對美方這個條件加以反駁：(一) 蘇聯和許多鄰國所訂的友好與互助條約，只是以制止德國侵略再起為目標，更無任何的秘密條款，正和美國與其鄰國，如加拿大，墨西哥，及其他美洲國家，為增進友好而訂的條約一樣，(二) 戰後東歐國家在政治上民主化的傾向，決非出諸蘇方干涉所賜，這乃是戰後民主力量優越於納粹與法西斯的自然結果。至於東歐國家共黨佔有各國政界要津，這也是那些國內人民視共黨為反對新戰爭的勇士所致。可是美國對希臘內政的干涉，却為蘇方所不得忽視者。(三) 歐洲的復興工作，應該放在聯合國範疇之內，不損害各國的主權，與蘇聯的利益。(四) 美在海外逐漸所拓展的海空軍基地，既為其國家官員與報紙所公開指明以包圍蘇聯為目的，自不能與其自衛需要相符合。(五) 最近西歐五國同盟，決不能與蘇聯以前對英法二國所訂之盟約同日而語，前者乃不僅以防德再起

為目標，且亦包括與二次大戰時之戰友為敵而言。無論英美法之報紙都曾公然指此盟約在對付蘇聯，美國對之更不惜加以鼓勵，自亦不能目為一種國際的自衛協定。（六）美國對國際貿易未能履行其條約上的義務，對蘇竟加歧視性的限制。蘇聯這個覆照，在上述六項說明之中，無疑

對美方的希望，提出了「反條件」。

對於莫洛托夫的駁覆，事後雖經史密斯於五月九日，接得蘇方照會後，當即加以指責蘇方破壞一九三四年美蘇復交時所締協定，但並未因此為談判之妨礙。不久杜魯門及馬歇爾相繼聲明，在蘇聯未進一步前，不擬與其舉行雙邊談判。即使這樣。我們仍有數事值得注意：（一）杜魯門於五月十三日表示願與史達林會晤於華府；（二）杜氏反對解散美國共產黨；（三）馬歇爾五月十二日的談話，已明白地說：美國決以堅決及有力的方式、執行其目前的外交政策，但對蘇聯毫無敵意或侵略企圖，（四）史達林於美蘇換文後，又發表談話，希望與美合作，（五

）一向感到困難的大連美領事赴任，忽然被允簽發護照，准經由海參

威前往任所。這些事實，證明美蘇的談判雖還沒有公開正式舉行，但確

已對這個談判鋪成了較好的路！

我們必須承認，此次美蘇國交的轉機，原是一年前兩史（史達林與史塔森）談話的直接後果。史塔森縱為在野黨領袖之一，可是他却純粹以美國人的資本主義立場和史達林作密談的，所以他對蘇聯的和平希望自然容易為普遍一般美國人民所了解。我們只要對今年四五月中美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初選的情形作一觀察，當知史塔森出乎意外的勝利，便足以指示出美國民意向背的一斑。當然史密斯大使奉命與蘇交換和平談判的文件，不能與此無關。同一理由，我們現在對華萊斯與史達林的交換函件一事，也不能有所忽視。華氏在那封信中，曾提出六項原則：（一）普遍裁軍，禁用所有一切集體毀滅的手段；（二）任何國家不得以武器輸往任何別的國家；（三）恢復兩國間無限制的貿易，惟對戰爭有關的貨物除外，（四）兩國間和兩國內，公民們，學生們，和各報記者們得自由往來，（五）兩國間恢復自由交換科學的知識與資料，（六）重建蓬蓬勃勃的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或設置某種其他的聯合國機構，以分擔國際救濟物資。同時還對莫洛托夫攻擊美國政策的各點，加以同情與接受，譬如尊重個別國家的主權，並不干涉他國的內政，禁止在聯合國會員國內設置軍事基地，締結德日和約，並從那些國家中撤兵，以及從中國及朝鮮撤兵等。而在五月十七日答覆華萊斯的史達林信上，後者更明白地承認可以之作為協調的基礎。誠如我們上面所說，看到了一年前兩史談話的影響，我們今天當然對華史的換函，更能相信它將激起美國輿論與政界的新衝動。美國務院當局，在史達林覆函之第三天，曾發

表十一點聲明（見五月二十一日各報所載），這就是美官方就華氏原函所涉及各點表明其態度的表示。

在當前曲線的外交行動下，馬歇爾儘管在十一點聲明中逐項駁斥美蘇懸案擱淺的責任，可是對於雙方談判却已指出了下列三種步驟與方法：（一）願與蘇外長會於華府，（二）未建議召開新外長會議，（三）對兩國爭端，除於美蘇可單獨解決者外，承認另有一種牽涉它國之國際問題，應由現有國際組織解決。這樣的聲明，實已無異對美蘇談判的準備，進了一步。美國政府對華萊斯的見解即使根本相反，對雙方舉行談判顯已作有期待。現在只有專心想破壞此項談判，而企圖在另一次戰爭火中取栗的人，才對華史換函目為蘇聯對美國內部創傷擦以食鹽的行為，而使其傷口愈為擴大。

（四）

美國今後的政策，是否果如李普門所論，將恢復美國固有的傳統，對其單獨所不能解決的糾紛，絕不捲入其漩渦呢？我們從其過去的歷史，上看，不難發現許多的佳例。譬如宣布對華門戶開放政策之後，不久美國即對日一再讓步自行跳出漩渦（如一九〇五年的Treaty of Portsmouth 訂定，一九一〇八年的Russo-Japanese 訂定，一九一七年的Treaty of Washington 訂定，再如一九二二年簽訂九國公約之後，美國對我東北的被侵，也始終抱着不干涉態度，以求退出中日糾紛的漩渦）。當然，這樣的政策其結果乃演成珍珠港的「奇恥大辱」！但到了戰爭快要結束的時候，這種老作風又被重演於雅爾達，故今日美蘇走到實質解決爭端的階段，其政策可能的變形，自更無置疑的餘地。

美蘇換文以後，在短短半月之中，美蘇雙方的政策，有數點值得注意：（一）美國起初固然願與蘇方單獨行談判，且在事前亦不與英方商酌，但經蘇方突然宣佈換文經過之後，美國在英方驚愕之下，不得不於最後略加改變，故現在已承認與它國有關的事，由現存國際機關談判，將來談判時重大問題。我們可拿好幾件事來證明，譬如像蘇聯更迭外長陣容，以前駐美大使諾維科夫調印，以前駐華大使潘友新調美，以前駐華大使馬立克接充葛羅邁科的職位，以及在美蘇換文之次日，蘇聯駐華大使羅申即行就道來華（在發表任命之後竟遲留了二三月之久）！而在華萊斯的公開信中，更提到：「美蘇均應遵守中國所有各民族享有同等權利的原則，尊重中國的主權，不得干涉中國的內政，在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的基礎上強盛而統一起來的中國，對於美蘇二國都有所裨益。

在馬歇爾五月十九日所作十一點聲明中，其第五點即指出了中國駐軍。

數字，並特別註明，此為應中國政府之邀請而駐於中國者。同時駐印大使諾維科夫，更於最近（五月十六日）表示：反對美駐印大使格拉第博士所提的尼赫魯計劃，五天之後格氏即被調赴希。於此可知，蘇聯不願亞洲成為獨佔資本主義榨取的對象，其態度已日益明朗，而美方對遠東的政策亦不復有堅挺之勢。故以丹諾夫在美蘇換文之後出任蘇軍駐德總司令蘇柯洛夫斯基元帥的政治顧問一事而觀，我們深信關於歐洲問題，美蘇間容或商有成果，是以克里姆林宮不得不加緊對歐的控制，且傳在東德的蘇軍中現正作政治整肅，而蘇柯洛夫斯基元帥的參謀長成柯特軍亦在其內。蓋蘇元帥固為一月前使柏林陷於緊張牴觸的負責者，今後為對歐保持守勢計，不得不出以比較謹慎的態度。

蘇聯對歐採取守勢，其直接的影響，當然便是移轉其目光於遠東方面。這個可能，老實說，就是促成美蘇從事談判唯一主因，這也可說是美國既然不能單獨解決某一糾紛，勢必找個夥伴來共同解決，而求得其自身跳出糾紛之目的。美國戰後「一個天下」的理想，今或真正步入於實際的階段，因此儘管國會中對改組聯合國及修改憲章的呼聲日漸強烈起來，杜魯門和馬歇爾還是反對修憲。很明白地，白宮當局現在的政策已採取現實的見地，潛藏於談判的另一面，很可能以「利益均分」的

獵物（booty）分配法來解決一切的美蘇冷戰因素。基於這個理由，英國自美蘇換文以來即陷於極度的不安。我們須知，英國過去的收穫乃是兩年來美蘇冷戰夾縫中的結果，今後勢必在 *post-war* 之下完全成為人家囊中物。是以目前為了巴勒斯坦問題而引起的英美微妙局勢，很可能使我們體會出外交形勢之變幻無窮！同時，英國近來對遠東的和約也忽然注意起來。因為美蘇談判如獲有結果，對日和會的困難將立見消除，英國頗有被出賣的危險。我們如對目前的國際形勢作一澈底的分析，當知我國與英國的命運實被置於同一環境，我們所愈感痛苦者，即朝鮮戰後的慘運太使我們對鏡自悲耳！

雖然如此，我們對於世界和平，如能本乎聯合國之目的，不管美蘇的談判如何，我們均將寄以希望。可是從三週來美蘇間的外交形勢中，已使我們認識到一個過分重視民主的國家，往往對外不能發揮全力的奮鬥，反而因此予人以可乘之機，使內政受外力的影響，殊足為我國今後的殷鑒。我國幼稚的民主制度，是否能擋住今後國際的巨浪，更應促成我們的猛省。蘇聯此時正對我更送大使，新大使於五月二十一日抵京後，一會發表簡短談話，以增進兩國友誼自任。我們希望外交當局能充分考慮我國之安全，在嚴密注視美蘇外交演變下，珍重此一新的機會，克服內政受外力影響之危機！

（五月二十日）

反對不合理的扶植日本

張 起 鈞

美國對日本的過份扶植，引起了我們的普遍憤慨，上海各大中學校學生，已有「反對美國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機聯合會」之成立，北方面，各院校學生，據傳亦將有同樣的組織成立，同時並將於近期召開講演會、座談會……等，喚起國人的注意，而用行動來抗議美國的這種不合理政策，我們並不是狹隘的國家主義者，一定要厲行報復，把日本踢入地獄而後已。我們也不是不知進取的墮落者，想從壓低日本的一切中來抬高自己的地位。但是人類的歷史若還不是兒戲，人世間若還有所謂正義存在，便必須要把日本當作戰敗國，必須要根絕日本的侵略勢力。這兩點若不能做到，我們便真不知道過去為什麼要和日本作戰，我們更不明白過去犧牲的生命和財產還有什麼意義。（參看本刊第七期「美國不要上日本的當」）不幸，現在美國的行動，便正是違反了這兩點基本原則，而在賠償問題方面的意見，便充分的表露了美國這種態度。

關於日本賠償的問題，美國方面已先後發表三個計劃，即鮑萊報告，斯瑞克報告及約翰斯敦的報告。這三個計劃的內容，一個比一個溫和，換句話說，就是美國愈來愈對日本姑息縱容，存心扶植。在鮑萊報告發表時，大家即感覺對日本的過於寬大縱容，及斯瑞克報告提出，還更形溫和，在斯氏建議中，移作賠償，主要作戰工業設備之總額已縮減為十四億七千五百八十八萬七千日元。而最近約翰斯敦報告的建議，則更縮減了幾乎三倍，其應償的總額僅值五億六千萬日元。在這後一計劃中，不僅削減了日本的賠償，並且蓄意奠定了日本的工業基礎，準備使日本成為東方工業和貿易的領導國家。扶植到這種程度，我們真不知拿日本究竟是看成了什麼地位，更不知將把其他的盟國，尤其是中國，置於何地。

約翰斯敦計劃，是此次美陸次德雷柏赴日調查團在日本朝鮮調查經

濟地位與展望，而撰之報告書，因草擬於最後報告之負責人爲美化學業銀行，及紐約信託公司董事約翰斯敦，故陸軍部稱此報告爲「約翰斯敦報告」此報告之內容計有下列各點：

(1) 貸款日本，使其經濟復原，使日本成爲遠東工商業之領導國家，約翰報告中，認爲此時予日本經濟援助，異日必有收獲，約翰斯敦並具體建議：一、貸款一億五千萬美元，專作輸入棉花用之周轉金，二、除陸軍部之四億美元救濟計劃外，更補以國務院與陸軍部共同主持之一億四千四百萬美元。

(2) 准許日本恢復其大規模之世界貿易，並主張取消目前對日本造船之限制，且許其購買或租用船隻。

(3) 建議中國將所產之原料售與日本，以換取日本之生產品。

(4) 主張將賠償削減至一萬六千五百萬美元其中，日本在中國東北台灣，及其他地區，已落入蘇聯及中國手中之國外資產，應正式承認爲賠償品，同時爲了減少推行的阻力起見，並主張美國經由麥克阿瑟元帥，採取片面行動以解決賠償問題。

從這個計劃充分表示美國扶植日本的意圖，他不僅未把日本看成敗國，反之却是要竭盡全力，把他扶植成爲遠東工商業的領導國，試問這還把共同作戰的盟國置於何地，這還把正義置於何地，若屬順理成章，出於公正的協助，還有可說，而現在却處處是在偏袒循私，背理情義，我們只看下面的例子，並可見其一斑。

首先就賠償來說約翰斯敦主張日本在中國東北，台灣及其他地區已落入蘇聯及中國手中之國外資產，應正式承認爲賠償品，這種表面看來理由甚爲正大，實際是似是而非之論，對於中國尤其是根本不通，在約翰斯敦的心中，凡是國外的資產，都應視爲日本所有，但日本這些資產是那裏來的，怎樣來的，試問約翰斯敦先生知道麼？假如這些財產若是從日本國內拿來的資本勞力和物資來造成的，那當然應該視爲日本的。殊不知日本並未會下過這樣大的本錢，所有這些資產大半都是徵發當地的人力，財力造成的。只講東北吧。東北在日本十四年的經營下，確是建立了強大的工業基礎，但所有這些資產全部是抽盡了東北同胞的膏血，奴役了東北同胞的生命來造成的。當時日僑驅使工役的慘酷，遠勝過秦始皇的修萬里長城，不知多少同胞在這種情形下，死無葬身之所，他們那裏把東北同胞當了人。生命且不值憐恤，何況次於生命的財產。在一九一八前，東北的人民是過着多麼富庶的生活，經過日本十四年的經濟建設，到日本投降時，所有東北的人民，都已是一貧如洗了，試問東北同胞的財產都那裡去了，只這一件事，便足以說明日本在東北資產的來源。現在我們要向日本清算這一筆血債還來，以及那約翰斯敦，反倒

輕輕要把這些東西算爲日本的賠償品，天下那有這種道理。

再把整個經濟關係的安排來說約翰斯敦主張，竭力支持日本，使其恢復爲一强大工業及貿易國家，而以中國大陸的資源作爲原料，的供給

，而中國呢？便以此資源物產來向日本換回製成品，質言之，就是要造成「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關係，大家若不健忘，應該記得當初日本軍閥要求不就是「工業日本農業中國」麼？所謂中日間的「經濟提攜」便是這種關係的建立，我們正因爲不能接受這種經濟上的附庸關係，所以才抗戰，現在日本戰敗，兇焰已戢，不敢存此忘念，沒想到美國反倒

來替他們作如此「同情」而「週密」的打算。真是喜出望外了，不錯我們中國是擁有大量的物資原料，但這些東西我們正要用來建設自己的工業，豈能送給別人製成商品，再來賣給我們。我們也承認目前中國從事大規模的工業建設，尚有種種困難，但這些困難正是我們努力克服的對象，豈能因噎廢食，因此一時的困難現象便放棄永久工業化的途徑？只上面這兩點便可看出美國對日本是什麼態度了，美國所以出此偏袒循私的態度，實是由於下列三種原因。

(1) 為日本的表演所惑，認爲日本已經完成了民主的變形，尤其看到日本人循善柔順的態度認爲日本業已完全悔過，衷心屈服於美國，因此便興奮的寄於友情處處爲日本打算了。試看這是多麼幼稚可笑的想法，美國人看事一向膚淺，對於東方的一切，尤缺乏深刻了解，以爲東方人和西方人一樣，屈服便是屈服，反抗便是反抗，他們不知道東方人「臥薪嘗膽」的傳統作風，尤其不了解日本人「辭甘幣厚笑裏藏刀」的陰險懷抱。

(2) 美國是商業民族，一切只知道從經濟方面打算，因此渴望把日本扶持起來，使遠東的經濟趨於繁榮，而對美國的經濟獲得重大的幫助。殊不知經濟並不是人類追求的唯一目的，而在國際關係方面，尤其有更重要的原則存在，我們不能僅問經濟是否繁榮，我們還要問是怎樣的繁榮，是使誰繁榮，尤其要問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若不把這些問題弄清楚，則僅僅的經濟繁榮，便完全沒有意義，因爲在國際間，經濟根本是附屬於政治的。

(3) 上面兩點，還不是問題的中心，而其所以要偏袒日本的癥結，乃是美國別有私念，想扶植日本使成爲防蘇的警犬，對蘇作戰的先鋒，就美國講起來也是一個妙計，但我們却請美國人不要忘了英國扶植德國的前車之鑑，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何嘗沒有這種打算，結果德國並沒有替英國火中取栗，反之却是揮戈直指英倫。教刻爾刻的教訓，當使英國人永遠不會忘掉。現在日本比起德日鄙卑陰險不可以道里計，只看珍珠港偷襲已經暴發而來，三郎仍坐在白宮裏談判那一幕，便明白日

本的作風了，以如此陰險作風的日本，一旦羽豐滿，勢必退則要挾作戰於兩大之間，進則要捲土重來，再肆兇鋒，他豈肯還俯首帖耳奉命去打蘇聯，這真是癡人說夢了。

上面是使美國遠背正義，偏袒日本的原因，假如這些原因，都正確到要從頭談起，我們不能輕輕地，由季節斷定戰局。

時，那麼爲美國之私益計，還未嘗不可，試言之，但經過上面的分析，這些原因因顯然都有問題，出發點既有問題，結果如何，便不問可知了，美國若不知此理，或明知而故犯，其結果的嚴重將不可勝計，而美國也只有準備遠渡重洋再度流血了。

門法，運動戰，華北戰局

本刊特約記者

春天，給人一種情緒上的苦悶。而華北的戰局，也像春天一樣，讓人感到苦悶。現在，春去夏來，夏天有苦悶的天氣，有時却會有一陣狂風暴雨，把悶鬱洗刷乾淨，涼爽得透人心脾。可是，華北戰局會不會像季節一樣呢？這到要從頭談起，我們不能輕輕地，由季節斷定戰局。

從去年十一月石家莊失陷後，逼使政府難出最後一張王牌，終在十二月七日華北剿匪總部正式成立，傅作義將軍於張垣宣誓就職，華北戰局的發展，遂轉入新階段。

華北剿總成立後，雙方的戰鬥，已不僅是兵和兵的撕殺，武器優劣的試驗，而是兩員主將傅作義和聶榮臻，在煞費心機的門法。往往兩個人的門法勝敗，並不見之於兩軍的接觸表現來判斷，有時戰場上的火拼，只是兩個人門法上的具體表現，或者有時僅僅是門法的延長，勝敗在他們心中早有了譜。像這次聶榮臻部，自察南入晉北，本打算拿下大同，可是傅作義早算到了，急速加強了大同兵力，聶榮臻不肯攻堅，又改換了目標，這一改換中，兩個人的門法，傅作義是勝了。讓聶榮臻空跑一遭，而大同醞釀激戰之前，左雲，右玉，懷仁，豐鎮等地，經一度接觸後，國軍便轉進了。但這轉進並不是失敗，正證明了這是門法的延長，因爲轉進的兵力，集中到大同去，聶榮臻不

致攻大同，便是空跑一趟，等於輸於傅作義。所以，傅聶兩個人的門法，反要比兩軍相戰重要，當然，他們的門法重著，還是在打算怎樣消滅對方的兵力，不過，因爲兩個人都在算，在門法，就減少了硬碰硬的大戰，誰的主力也沒消滅。

傅作義和聶榮臻的門法，并不自今日始，不過是因傅作義主持整個華北戰局，所以和聶榮臻門法看着像越發地激烈，且漸漸到了頂點。其實遠自傅作義出奇兵收復張家口，聶榮臻被迫轉移時，便展開了門法，而門法的事實證明，可以看出聶榮臻已成傅作義手下敗將的跡象。聶榮臻吃了虧之後，無時不在圖報仇，聽說朱德對聶榮臻失去張家口，很不滿意，曾有一個指示給聶，要他的兵重作個好的「表現」，言外之意是叫聶想法拿回張家口。但是聶榮臻有自知之明，沒有去硬拿張家口，只攻下了石家庄，這在聶有兩個用意，（一）拿下石家庄，可以緩和黨內的攻擊，因爲石家庄也是個城市，丟一個城市拿回一個城市，總算差強人意。（二）他的力量還不够反攻張家口，不如攻下石家庄，利用石家庄廣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去擴充他的力量，有了充沛的力量，自可以作個好的表現。聶榮臻於是就積極擴軍，除原有的第一，二，三，四，四個縱隊之外，增 加了第六，七，兩個縱隊，其中以第六縱隊戰鬥

力優秀一些，因是由原來四個縱隊中各抽出一部，加上大部新兵組成的，而且有砲兵配屬。第七縱隊則完全是新兵，力量較差，但還足以保衛後方，所以這次聶榮臻北入察晉，只帶了一，二，三，四，六，五個縱隊，把七縱隊留下，讓它在游擊戰，遭遇戰，保衛戰中鍛鍊成長茁壯起來。至於第五縱隊的番號是沒有的，據說聶榮臻是爲了避諱人的指責。「第五縱隊」這個名稱，在二次大戰中不是很叫人討厭和辱罵的嗎？聶榮臻便把五跳過去，最近有些書報的報導上，說大清河南岸有第五縱隊的番號出現，完全不對，在大清河兩岸活動的，僅是第七縱隊。此外，聶榮臻還大量編訓各縣民兵，也讓他們在不斷的小戰鬥中成長，以備作將來補充正規軍缺額，並且在冀中各縣征集了一萬五千份的擔架（起碼要三萬個民伕隨行）。聶榮臻這樣急於備戰，自然是爲了求更好的表現，保定已成了死城，他不需要全力去攻，忙着去拿。但保定在政府手裏，則形同鷄肋，政府爲了保存它，爲了將來用它作向南發展的基地，不管聶榮臻是不是真攻，都要小心和分神，而且要駐上重兵。

同時，國軍方面吃了石家庄的虧，怕河北淪入萬劫不復，把部署統一了，成立華北剿匪

總部，雙方正好針鋒相對，準備新的大砍殺。當時的蔣榮臻心中當然有一番打算，起碼仇人見面，會分外眼紅。對這位專打自己起家的僥倖作義，自己當然要想法子打擊他一下，不然自己還沒去察省找人家，人家反到河北來找自己，真有點難爲情。這並不是推測之詞，實在是蔣榮臻，這次非去察南晉北發展不可的一個主因。

是在去年的十二月二十七日，華北剿總規模小俱，而蟲榮臻已整補完了。蟲榮臻爲給傅作義一個下馬威，收一個先發制人的功效，蟲榮臻發動兩大行動：一是對華北各鐵路加以普遍破壞，想使傅作義手忙腳亂，他好趁隙而攻二，是以一部兵力，向平保路徐水漕河間猛犯暴雨中，表現他的利害。另外，察東的共軍，也採取了呼應的行動，企圖切斷平綏路，阻止察綏軍調動。然而傅作義和蟲榮臻不失爲「棋逢對手」，傅作義對這迎面掀來的大風暴，以不變應萬變，把它遏止住了。全面的風暴，既沒把傅作義留住，蟲榮臻便把他的老本第一，二、三、四、六、七六個縱隊，從石莊調到保定至房山之間，擺開了陣勢，要和傅作義幹一下。先是在傅兵圍（包括騎兵，汽車兩部隊）沒在平保段部署完善的定興迄漕河間，集兩個縱隊猛攻，圖一攻而下，抑制平保交通，垂手可得保定。一時情勢確實緊張，這之間，傅作義和蟲榮臻又在鬥法，蟲榮臻給傅作義的風暴沒生效，同時察東一戰本來是和傅的運動比賽而得保定。然而傅並沒「疲於奔命」。所以大犯平保段，和傅再作運動戰，傅將軍看得清楚，傅忙於運動而吃虧，遂讓平保段陷一時危急。把各方面的部署弄好，判明蟲榮臻六個縱隊兵力，確已集於冀西，才從容地把大兵圍調過來，和蟲作一個門法上的具體表現。傅兵圍到平保段定興徐水相繼解圍蟲榮臻的一，二，三，四，六等縱隊，都吃了不少敗仗。傅兵圍之來，是要消滅蟲

的主力，來勢洶湧，聶榮臻却也乖狡，一面發動他在津南的獨立團、配合仇鴻印（平常多把仇誤成仇）部，來一個大開小站，兼擾大沽，藉以轉移目標。一面便把他的三四兩縱隊插入冀西山地塘湖一帶，其餘的一、二、六、七各縱隊，便和追擊的國軍，且戰且退運動起來。從定興直瀉保定滿城山地，國軍大兵團追到山地，國軍之勢實如破竹，斬獲也多。聶和陳的鬥法，又入精彩階段。在一月十一日夜，聶榮臻把他的三四兩縱隊，從山地拿了出來，直撲冰水，展開了全國注目的「冰水之戰」，聶榮臻這一下，是企圖一：傅兵團主力南下後防空虛，取冰水，可從容而叩北平之門。二：傅兵團主力南下，後路截斷，孤立在死城保定，他的一、二、六、七各縱隊，以多數包圍國軍，當可消滅國軍主力，且又能拿下保定，三：傅兵團果被消滅，河北必亂，守北平，天津的國軍，當不難打垮，平津保三地，一戰而可兼得，確屬算盤如意。可是，聶榮臻的算盤沒有打好，聶榮臻抽到滿城的第一、二兩縱隊也趕回助戰，情勢奇緊，正岌岌可危之際。追到保定的傅兵團，開到增援，調動之速聶榮臻始料所未及。四個縱隊兵力原不想和傅碰硬，僅是想速戰速決，以大吃小，成則成、不成則跑。但是傅的主力來了，跑已不及，勢成騎虎，只好一拼。雖然傅折損魯，李兩員大將，聶榮臻在傅空陸猛擊下，也落個一蹶不振，元氣大傷，分路逃向山地，傅轟悲戰，於焉結束。

在保定發生牽制力量，這些足以證明蠭榮臻的兵力，是和戰鬥對消了。傅作義親率大軍，初到河北部署未定，經此大戰，幸而沒出意外挫折。正好利用蠭榮臻整補的時間，展開了棋密部署，並派出了游動部隊，作掃蕩戰，積極把點聯成線，把線擴展成面，很做出不少成績。一時報端上登載的「挖山藥豆」戰，便是傅將軍手下弟兄的傑作，他們把潛伏的共軍，挖了出來，好擴展點，線，面，——造成廣大的面。華北戰局在傅和蠭門法之下，好幾次的小運動戰，經淶水之役遂告一階段，表面上戰事暫時的結束，却正是另次大戰的開始。我們從傅聰的門法上看，如果說蠭榮臻確是傅作義手下敗將，並不嫌主觀和武斷，因為事實證明如此。不過，這位敗將蠭榮臻，有着雖敗猶榮的精神，在他的主力受到打擊或消滅以前，他還有股蠻勁，還不算完全的敗。正因為這個原因，華北的戰局在春天籠罩下，也洋溢着一片苦悶。

沉寂有時是大亂的前奏，到了三月，雙方頻繁地調動起來。據說聶榮臻計劃以整補後的力量，再給傅作義一個全面風暴，他打算在三月八日，分在冀東和冀西，以破壞交通手段，爭奪之平津保三市為目標，作一個廣泛行動。這樣無論成功與否，將都極有助於他去察南作戰。於是，加緊了冀東、冀西的調兵遣將。誰知傅和聶鬥法，傅又勝了。傅將軍悄悄地把他的騎兵和汽車兵團，調到冀東，先發制人，在七日的早晨，對盤踞在香河寶坻兩地，共軍第十四，十五兩軍分區所屬五個警備團，展開奇襲。共軍初未料及此舉，所以倉皇不支，據華北剿總發表，這一仗把共軍五個團消滅了。傅兵團是採速戰決戰術，七日打的仗八日便結束，正是聶榮臻在冀西發動攻勢的日子，也許是聶榮臻不相信冀東的五個團，一日之間會垮了，或者是聶不知冀東的詳細戰況。所以在八日

正論

晨，聶榮臻竟依計劃展開了行動。攻徐水，漕河，炮轟保定。傅將軍冀東大勝之餘，力量充沛，自然能毫無疑慮地應付這個攻勢，聶榮臻鬧了一天，感到處處都挺硬，而且知道冀東失利，於是便在九日晨停止攻勢。一場好戲却又戛然沉寂下去。這次，可以說傅又把聶門勝了，不然聶的行動成功，真是吃弗消。剿總發言人曾在電話中告中央社記稱：「此次冀東匪軍之竄擾，係企圖擾亂平津外圍者現已被國軍完全粉碎矣。」

聶榮臻在冀東，冀西行動既沒成功，調回頭來親率第一，二，三，四，六，五個縱隊，循着山地直搗察南。在聶榮臻調動之際，戰場表面上重現平靜，然而傅聶的鬥法正無言地展開，運動戰也不斷地進行着。聶榮臻在八日失利，經過七八天的遠程運動，三月十九日在察南晉北，又燃燒起普遍的烽燧。但是剿總早判利，經過八日夜冀省有戰火熄滅的同時，對察南晉北的部署，不言不語的完成了。安靜地等候聶榮臻隊伍開到。傅和聶的鬥法，傅又佔了上風，聶榮臻一心是想跑到傅的後門，放一把火大鬧一下，並且計劃着傅的集團，不會調的那麼快也許能拿回張家口，果然，聶榮臻到了察南晉北，在十九日夜分在各要衝發動了攻勢，並把攻勢重心，分置在張家口以南的大門蔚縣，大同以南的要衝懷仁，然後分段破壞平綏交通。特別是平張間路軌，以隔絕傅集團的調動，表明他要攻張家口，或是大同的陣勢，同時平古路的激戰也打起來，爲了陷平綏路上的國軍於兩面作戰，以利於他進攻張家口。不過，平古路的戰事，不久就被國軍石覺部給解決了，平張間的交通也沒被中斷，冀察國軍調動靈活，國軍爲了吸引聶的主力，反而自動地讓出蔚縣，桃花堡，花梢營等據點，希望聶踏入八大門，直叩張家口，以乘機消滅他的主力。聶一看自己處處計劃失

敗，張家口駐有重兵，便避實就虛，掉過頭來去攻大同。可是大同又硬，國軍已擺下圍殲其主力的陣勢，以逸代勞。聶榮臻自然不肯上當，一口氣又跑入綏東南，拿和林，犯涼城，想援完成圍殲部署。聶榮臻雖然拿下了和林，涼城，托克托等通歸綏是座空城，攻來當不費事。誰知國軍的汽車兵團，以快速姿態，到達增勢，他知道縱然沒有大量國軍嚴陣以待，如果自己冗長補給綱，被大同守軍遮斷，勢必困在沙漠，在空室清野的環境下無法生存，占一座城又有什麼辦法呢？所以，抽師回來，想再試試大同、結果不行，大部兵力就盤踞在察晉間的山地裏。這裏，多了一個插曲，那便是傅作義和聶榮臻鬥法，傅飛到集寧部署軍事，在集寧起飛返平的一幕「失事」險劇演出，但失事並沒出危險，察晉綏的戰局，也和傅乘機失事一樣，是有險而無災禍。

力。傅將軍對共區民衆的反共熱情，深深地感到興奮和滿意，他對戰局前途更加樂觀了。聶榮臻爲了表示鎮靜若定，爲了遮一遮奔跑察南晉北綏東南，而一無所成的羞，便發動了一，六兩個縱隊的絕對優勢兵力，向大同以南孤城應縣猛撲。雙方的估計，這個城是勢必易手的，誰知守城軍民，在空軍支持下，竟英勇空前。聶部久攻不下，晝虎反類犬，不得不數度總攻，可是守軍也不得不死守，終於守了一經多月。聶榮臻所以非攻不可，當然不只是爲遮羞，還因爲一：應縣深深楔入晉北共區之中，成爲衆大阻障。二，渾源，繁峙，山陰，廣武等地不堪共軍之擾的人民，相率集中應縣，尤爲共區的威脅，且應爲國軍南下開展，最前方的有力基地。三，應縣屹立，梗滯了共軍晉察，晉冀，冀晉察，形同在咽之刺，而且應縣人民的突擊隊，又時常出沒城郊，打游擊，搶軍糧。四，要想攻大同，必先拿下應縣，始無後顧之憂，也可免去隱患。所以聶榮臻不惜一攻，但屢攻屢挫，心有不甘，又會合賀龍，姚守等部，前後發動兵力三萬多人，圍攻不退，守城軍民也死守不聲。實際守軍一個團，只是游擊隊，勝利後中央給了個「團」的番號，這團兵當然是越打越少，後來整個應縣都由人民負責拱守，由此說明了一個事實，便是人民反共的情緒增高，人民寧死於攻防戰，也不肯讓共軍統治，同時也說明了共軍的實力如何。截至五月二十三日止，被圍攻一個月零七天，終因援軍到達而圍解。

在聶榮臻進攻應縣的後半期，傅將軍又得了門法上的勝利，他在五月十三日，迅速的派兵南下攻克了應縣，桃花堡，西合營，把察南肅清。安定了戰局的後門之後。立刻把兵抽調回平張段上，因爲他和聶的門法上，他知道一：共軍察南晉北之擾，已成尾聲，察南聶部主力回到平西，想攻北平。二，晉北共軍攻應縣

亦成強弩之末，大部主力也調到晉冀邊區山地整補，而他派的援軍即可到達應縣，應縣圍解，晉北自可開朗，大局底譽亦除。因此，剿總政工處閻副處長又文，曾在五月十五日記者招待會上，笑迷地說：「董榮臻這次在察南晉北的運動戰，是全盤皆敗了！」但是，他說話那時，晉北的共軍攻應縣正兇，察南共軍主力轉入新局勢，可知傅聰的門法，是如何地奇幻莫測，而傅永遠壓轟一頭，對聰的行動，有絕對的控制力量。

又是一個突然，察南董榮臻的二、三、四三個縱隊，從察南越過冀察山地，開到平西妙峯山南口西南一帶，打算在平西來個大運動戰。董榮臻豈知傅將軍早已佈下陣勢了呢？聰還是依照預定計畫，以四縱隊攻康莊，牽制平張交通，再以二、三、四縱隊各一部，共五個兵力攻南口。十八日的清晨，董榮臻和熱河共軍行動呼應，展開了行動，南口，古北口，這兩個通北平的「口」同時發生激戰，一時北平東北，西北，正北儼然又像面臨新風暴，傅將

「戡亂河北」與王鳳崗

本刊特約記者

攤開河北地圖，用紅藍筆把所謂「革命邊區」與「戡亂河北」劃分開，很明顯的，那一

革命邊區」是體大面肥，這「戡亂河北」却像一位手足癱瘓，肌肉瘦削，血管寸斷的病夫。再加上些內在的神經麻痺，營養不良諸般雜症。若不是呼吸器管——海口與心臟部——三角地帶還算健全，這戡亂之局恐早已不堪再戡了！但是凡一種惡情勢的形成，絕非一朝一夕之「功」！在宣稱河北局勢好轉的今天，我們顧由根

又歸傅作義了。國軍釣魚，雖然大魚不來，五個團的魚也不小，鄂友三的精兵，便從康莊開了過來，和一個團的孤軍呼應，在南口西南下店，南柳村一帶地區，完成了包圍網，國軍的B-52型機也輪流出動，展開了大聚殲戰，一日一夜之間，把上下店，南柳村地區，差不多被砲彈轟平了。據軍方發表，共軍五個團消滅十分之七，斃共軍約六七千人。另據逃來的難民說：共軍的五個團，國軍的一個團，還有老百姓，幾乎是同歸於盡了，傷亡當在一萬二三千人以上。在南口裏的共軍吃了虧，南口外康莊西盤子間的共軍四縱隊，攻勢却頑強，因為承德被攻甚急，傅兵團一部已開往增援，如果能佔領康莊，則傅兵團無法回師。二、三兩縱隊很可能會合其他縱隊和另部共軍，到察南再

軍為穩善應付，毋怪在十九日各報上發表的「釣魚消息」，來安定後方。終歸國軍實力雄厚，首先擊潰了古北口的共軍，繼在南口以一個團兵力吸引共軍五個團深入，據國軍的打算，是希望轟的二、三兩縱隊主力跟蹤而來，但轟狡黠得限，踟躕不前，因為他知道門法的勝利又歸傅作義了。國軍釣魚，雖然大魚不來，五個團的魚也不小，鄂友三的精兵，便從康莊開了過來，和一個團的孤軍呼應，在南口西南下店，南柳村一帶地區，完成了包圍網，國軍的B-52型機也輪流出動，展開了大聚殲戰，一日一夜之間，把上下店，南柳村地區，差不多被砲彈轟平了。據軍方發表，共軍五個團消滅十分之七，斃共軍約六七千人。另據逃來的難民說：共軍的五個團，國軍的一個團，還有老百姓，幾乎是同歸於盡了，傷亡當在一萬二三千人以上。在南口裏的共軍吃了虧，南口外康莊西盤子間的共軍四縱隊，攻勢却頑強，因為承德被攻甚急，傅兵團一部已開往增援，如果能佔領康莊，則傅兵團無法回師。二、三兩縱隊很可能會合其他縱隊和另部共軍，到察南再

求表現，甚至可拿下張家口。因為轟部占的妙峯山一帶地區很好，北可攻張家口，南可叩北平之門。傅將軍不會吃這虧，出動了陸空精銳，把四縱隊打垮，同時承德的戰事沉寂下來，晉北應縣圍解。

包括冀察熱晉綏五省大運動戰，經傅將軍的運籌帷幄，一鎮定應付，到目前好像是寧靖了。不過，依然是像前面說過的一時沉寂，並不是結束而是再度大戰的開始，雙方的士兵可在對峙中稍息，傅聰兩人的門法可沒停止，也正是開始着再度的大戰。

依傅作義和董榮臻的門法，和運動戰的結果看來，傅將軍是有辦法的。湯恩伯將軍曾誇過傅氏是「不挨打，找匪打，而且打的好」的統帥。董榮臻的每一行動，都在傅將軍把握之中。不過，目前所可注意的是熱河戰事，熱河的攻勢，這將起的風暴，是傅聰再一次的門法，傅也許會鬥勝話，把風暴消滅於無形！

那麼地方與中央政府起碼負失察之責。何況比河北更糟的東北與山東的代表們又將如何？其實他們的叫囂呼號不過是些表面文章，骨子裏自有另一番道理；遠在去年河北軍政大腦更替時。所謂河北紳士們曾經表演過一場「先反對」，後請駕的矛盾好戲！其所以能有此好戲的演出，推根溯源不過是在鄉土裡長成的中國人一些特性發揮而已。所謂士紳也者，本身就是地主特權者流，永遠不會拔盡封建意味的地城觀

冀人治冀的根本原則與渡及到他們私人利益的人事陣容。可是傅宜生，楚清波，何等聰明。在一個多月相應不理的措施下，把問題拖「大」，再「拖平」。順利的接收省政府，那時士紳們在「口雖不言，心其誰服」的高度忍耐下，一轉而為擁護新政府。他們以為「力取」不成，且用「智取」！但以此種不正確的心情度量智巧著稱的傅宜生是犯了否定之否定邏輯上的毛病。傅宜生知道所謂士紳們的人生目的第一章是「私慾」。其次是小圈圈的所謂公利，採取「大而化之」的態度，個個擊破。在短短幾個月的時光，大家就異口同聲的歌頌「新政」了。及到這次行憲國大召開，大部士紳戴戴國大的帽子，紛紛去京，傅將軍，看時機已至，遂巧妙的指揮大青山之王鄂友三，馳騁於河北平原，穿心一戰，克河間，攻任邱。與其說那次行軍是軍略第一，勿寧說政治收獲佔先。在另一角度上，引逗起國代們的地域觀念。把他們那不健全的心理，利用為宣傳的工具，達到了戡亂河北需要的一剝總職權的擴大與自衛特捐的便利。事實上傅的一套均富原則施行起來，代表特權地主的士紳們將作何感想，恐怕是「悔已晚矣」。不過這也是時勢所趨，非人力之可以左右的！

新城起家的王鳳崗

在戡亂河北，所需要的軍人第一。在河北士紳們的心理上，軍人是保護他們私人利益的騎士，順理成章最好是以同籍軍人來擔任這騎士的任務，最為合理。河北省籍的軍人，當然不少，但軍人中那些小兵，小官，士紳們並不注意，至於這軍職官員（將官者流），又大都是各有派系，成為全國性的人物，當然不可能是省籍專用騎士。因之他們的目光集中所在，

他的方法也都脫不開鄉土氣味。就爲了這些，有些站在某一角度上戡亂人士們，會對他表示過嫉妒的不滿。在這次河北省軍事檢討會議後，記者曾聽到一位不小的保安官說：「王鳳崗是個準八路！」這句話的意思，是指王鳳崗一切重視鄉土的辦法，與共黨的一套接觸上，只有立場之不同，方法上是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區別。這同共黨稱「人民」，政府稱「民衆」，意義上是一樣的。何況人民世紀的今天，只要頭腦沒有昏曠到不辨東西，誰也不會喊出反人民的口號來！王鳳崗知道人民的利益是什麼！民衆的淺陋在那裏，所以他極力在這些地方找出路。土地安全是一般農民的最低要求，所以他的士兵可以由農民中拔選出來，他知道小農民的自私，所以他的部隊作戰是爲了保衛小農民的田地而戰鬥；部隊給養來源也採取「合理負擔」的方式。他更瞭解封建農村制度下，農民的孺弱性與反抗性，因之他把作戰區同安定區劃分開，對安定區採取和平的接近撲風氣。對作戰區（也就是通稱的三不管區）則採取高度的威壓方式，迫使人民爲他作工作的目的。同時嚴命部屬簡衣陋食，處處提倡簡朴。他的一个忠實部下說：「人民像皮球，你壓的力量小，他會反抗一下，你加上最大的壓力，他絕對高壓，因爲奸匪的利誘與殘殺是人民同情協助我們，不成問題，我們負責他們的安全。如果有同情奸匪的，或遊離份子，我們對他們最怕的方法，我們的高壓正是減輕人民的怕共心理，增強人民反共意識，使他拿出勇氣來反抗奸匪。譬如每當我們克復一個村子，必要的先檢舉壞蛋，富衆審判，如果民衆恨他『我們』就根據民衆的意志把他處死。這樣做，一方面給村子裏壞蛋一個打擊，同時也給一些不堅定的遊離份子以威嚇。以堅定民衆的反共意志！」這段談話，可以代表出王鳳崗的力量所以堅強的根本原因！

美國應有的外交政策

W 李普曼著
華毅譯

我們在研究過去四十年外交關係的時候，一定為那些特殊的矛盾而覺得驚訝。

在這四十年的過程中，美國從長期的孤立變成世界強國之一。而且在這段時期中，美國的人民也經歷了兩次戰爭與和平的考驗。可是美國究竟在過去重大的事變中能否確定一種外交政策，使美國能够很正確的預知如何應付現實而不失敗？過去的記載很清楚，美國打了兩次勝仗，可是在緊要政策的運用上，並沒有正確的外交政策。美國的外交政策並未能阻止戰爭，亦未能避免戰爭，更未能在戰爭終了後解決戰爭的問題。

在這時期中美國並沒有任何事蹟以滿足自己的宣言和希望無論美國如何嚴肅和熱烈的再三表示她的政治目的，其結果一次也沒有成功。

從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七，美國相信並希望她能避免第一次大戰，可是她被迫參戰了。而且在參戰的時候，因為她相信不必參戰，所以並沒有準備，在作戰的時候，美國希望並且相信她一旦如能戰勝，勝利能促成長久和民主的和平，第一次大戰勝利了，可是她預先担保的和平並未能實現，其後，美國人相信，一旦再有戰爭，美國一定能够不受到牽連，所以她又沒有準備戰爭。結果呢，當戰爭真的來臨時，美國竟又不能逃脫。

當第二次大戰進行之中，美國又相信只要戰勝德國，那麼戰勝國之間一定能够非常融洽，對於戰後如何始能有一個公正和永久的和平的條件，各強國會完全一致的。我們又打了勝

仗，可是我們並未能達到那個企望的和平。

現在呢，美國又在討論第三次大戰的可能性了。所以我們應該自問：「是不是我們已經陷入逾變殘忍和逾擴大的戰爭圈套」。這確乎是一個深切的問題，對這個問題，我們是躲不開的，而且我相信在回答牠的時候必需這樣的說：「倘使我們現在的預計和估計並不比第一次和第二次大戰以前，當時和以後的正確，那我們又要受到意外的襲擊與失望。我們又將要不知如何去阻止戰爭，不知如何去正確的準備戰爭，即使假定我們再能打一次勝仗，亦將不知如何去達到和平。再說，要是第二次大戰跟着有第三次，因為我們既然在每逢勝利之後，不知如何去處理他，我們有什麼理由去解決第三次大戰的問題，而再沒有第四次大戰呢？」

在二十世紀中，我們親眼看到美國的興起，她已成為世界各國的領袖，她對於人類的命運開始負起很鉅大的責任。可是從另一方面看來美國在興起之中，豈不會把許多充滿了希望的宣言置於無效，視為廢物？好像威爾遜的中立宣言和十四原則，國際聯盟，華盛頓軍縮會議，非戰公約，道維斯計劃，楊氏計劃，司蒂姆生防止侵略之原則，第二次大戰通過的中立法案，羅斯福的演說主張和四大自由，赫爾的十七原則，大西洋憲章，雅爾達宣言，和杜魯門主義。

我們回想這些宣言，和跟隨着宣言的失敗，我們一定要對擴張自己國力的能力和運用國力的能力，相去懸殊，而覺得驚駭。很清楚的，我們的失敗是由於政策的失敗，這就是說：「我們在運用自己強大的國力和勢力的時候，

並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怎樣的，和爲了什麼目的去運用牠」。

美國所以在過去四十年中，誤用她的外交政策，不可否認的，美國有美國的缺點。她是有強國中最不容易受到侵略的國家。她的資源豐富，在戰時，她能生產鉅大的反攻武力，在平時，她能生產大量的出口剩餘物資。過去兩次大戰已經證明了美國軍隊的勇武，美國人民的防禦能力，和美國軍事長官的指揮機智。美國的制度和傳統也受到了推崇。一般講來，美國自參加世界現實的政治的結果，他已經受到了大多數國家的歡迎，因爲她象徵着預先允諾的自由，公正，和平與繁盛。

因此，我們必須思考我們外交失敗的原因，在處理對外交關係而決定政策的時候，不應該僅從物質環境中尋找以往失策的緣故，而應該從我們思想的習慣中去尋找。從威爾遜到杜魯門，我們的外交政策，不斷的在一定的形勢下犯錯誤，因爲在我們的腦筋中，對於我們與其他各國之間，已經起了一層隔膜。這完全因爲長時期的偏見和奢望；造成了錯誤的解釋和批評，阻止了可能實現的政策的執行，以致美國已有的方法和能力，都不可能施展於可能實現的目的。

美國從剛立國邦和十九世紀孤立的時候，帶來了一個理想的世觀念，這種觀念是哲學性的，並且我們以爲是真實的和崇高的，而事實上呢，這是錯誤的，這是幻想。因爲我們哲學性的國際生活，是幻想的和錯誤的，所以我們哲學家要想在世界中有所有效的行動，不免就要失

敗。

那麼究竟我們的哲學觀念，為什麼不斷的使我們在外交政策有錯誤？我在前面已經提到；因為我們以往的政策，不外想去阻止戰事，去處理戰爭和準備戰爭。所以我們應該從我們過去處理戰爭與和平的歷史教訓中尋找錯誤的因素。我以為我們的錯誤，是把國與國之間的鬥爭與糾紛，視為人類不正常的情形。美國通行的哲學觀念都否認這個事實，否認在現在的世界中，為生存而鬥爭，是最自然的事。我相信這就是阻止我們決定有効外交政策的原因。

在美國的理想中，為生存而鬥爭，為爭取利益而引起糾紛，認為這是錯誤的，不正常的原因。因此我們過去所有的外交政策都被一種信仰所控制，我們以為鬥爭並不需存在，牠是可以避免的和廢除的。由於這種信念，我們過去外交政策的目的，不是去糾正和緩和糾紛及權衡敵對的勢力，我們的目的若不是設法躲避戰爭就是想立刻去廢去牠，要不然就是去領導十字軍，消滅挑撥鬥爭的國家。

可是，事實上的世界，鬥爭並非不正常。而且鬥爭永遠在消滅和再生。過去我們曾兩次宣佈中立而想設法避免被捲入戰爭，可是都沒有成功。過去我們曾兩次相信擊敗了挑撥戰爭的國家，一切的糾紛都可以被消滅，我們亦都失敗了，過去我們又曾兩次想用全世界性的機構，如國際和聯合國來廢去鬥爭，可是鬥爭依然存在。

在二十世紀，美國因為否認為生存而鬥爭是合理的，所以產生三種行動的方式：第一，用中立的方式，假定鬥爭是可以避免的；第二，用十字軍的方式，假定一日擊敗挑撥的國家，鬥爭即可停止；第三，利用支援國際機構，假定鬥爭即可以被廢除。

自從一九一四年，美國的外交態度，始終逃不出這三種方式的變化。現在美國國內對於

它們已經起了很大的爭論。可是我想，由於過去四十年的經驗，倘使我們還堅持為生存而鬥爭是不正常的，例外的，反常的，我們將永遠不能決定一個有效的外交政策。我們美國式的理論，產生於當美國還不是一個弱國，不必負擔強國的責任。可是這種理論，現在當我們要去處理強國間的糾紛，要想去權衡我們的目的和威力，它把我們的判斷給曲解了。

當國家的一舉一動可以關係生死存亡，其外交政策必須非常現實化，無論一個國家的財力，威望多大，她的能力是有限的，世界並沒有絕對的權力，政策的決定是選擇有限止的目的，並不是選擇最佳的目的，而要選擇一不必使用全國財力，不必用國家的生存做賭注的最合適的目的。

可是我們若研究一下過去對於外交的態度，我們始終不求相對性的，而求絕對性的目的，不是孤立主義就是大一統主義，不是全面和平就是全面戰爭，不是裁軍就是使用最利害的武器，不是神聖的呼籲就是原子彈，不是裁軍就是軍事絕對優勢。不是不干涉主義，就是十字軍主義，不是民主就是暴君，不是廢止戰爭就是阻止戰爭，不是妥協就是無條件投降，不是抵抗就是殲滅性的戰略。

在這種美國式理想世界的觀念中，對於敵對的勢力要想用權衡，要想對利益範圍及勢力範圍加以劃分，要想採用妥協與和解的方法，要想使現狀穩定，要想恢復國際間均勢，就沒有機會去利用有限度的目的及有限制的方法。可是這就是運用外交的範圍，這些就是有效的現實外交的實質和事實。

可是我們的理想家們，以為運用勢力去達到及支持均勢就是「強權政治」。而且以為承認勢力範圍，就是妥協。不過，我們既沒有達到世界大同，在國際間又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控制全世界，因此，在列強之間必須承認均勢和

勢力範圍。何況現在的外交政策，每一面高唱和平宣言，一面進行殲滅戰的十字軍。所以現在的外交政策，就不得不運用均勢及決定勢力範圍。

可惜在我們理想世界的觀念中，我們把這些外交上最主要的目的置諸不顧。不但使它不合法而且還不許人民去討論它。我們還堅持國際間的仇視不應該存在於思想正確人們中的主張，我們因為主張國際的仇視不應該存在，所以不想法去糾正這些仇視和敵對。結果美國的外交政策就不外乎這三套：第一，用宣佈中立仇視，要不，就相信在國際機構之下，仇視可以被消滅，第三，對於那些不顧和平呼籲的挑撥國家，用十字軍來殲滅牠們。

現在美蘇之間的糾紛衝突，是世界性的，我們都為這種外交關係而憂慮，那麼我以上所說的意見，對於這種美蘇關係，應該有怎樣的解釋呢？

蘇聯承認東西歐的分裂及其與西方國家的敵對的歷史事實，並非起始於馬克斯，列寧和史大林，亦不因為把蘇維埃政權傾覆或擊敗而終止。東西歐之間之分裂和基督教的東西羅馬的思想分裂一樣的有其歷史性，蘇聯在波羅的海，歐洲東部及中部，多瑙河流域，巴爾幹半島，中東和遠東的鉅大的敵對性，並非起始於共產主義，亦不因為共產主義的消滅而終止，沙皇時代的外交政策和現在共產黨主義下的外交政策是一致的，美蘇的敵對在美國是個新聞題，但在英國的外交部已經被佔了一百五十多年。美國的人民最好現在就準備好將來一段長期的糾紛。

事實既然如此，希望世界大同或與蘇聯協手，或者使世界分裂，美不滅蘇，蘇即滅美的觀念，不應該再存在了。我不相信美國不和蘇聯協手就非戰爭不可，也不相信沒有完美的和

平就一定要有全面的戰爭。可是我相信最好的外交政策要去承認國際間敵對性的存在，並不要希望牠消滅，也不要想像聯合國可以去除牠，更不要夢想了勝仗就可以消滅牠；我們只要承認國際間敵對的存在是一個永久性的事實，然後用我們全部的力量來調節牠，使牠不超出限度，用建立勢力範圍來限制牠，並且用世界均勢的方式來節制牠。

我不相信蘇聯問題可以一次被永遠解決，可是我相信只要我們有效的運用我們足夠的權勢，我們很可以在這一代中得到美蘇問題的解決，當然這種解決並不能完全合乎一致的理想。

以上這些問題，都要待第一任的憲政總統來答覆，這種答覆，不是發表長篇大論的宣言所可濟事，是需要以事實來答覆的。國民大會通過的動員戡亂時期條款，使總統的權力大形擴大，原文如下：「總統在動員戡亂時期，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為緊急處分，」不必先經立法院立法程序之限制。

我們在此記起一件事，就是蔣委員長在重慶的時候，曾與當時美國的駐華大使赫爾將軍有一席談話，當時的委員長，就是現在的總統，據云說過這樣的話：「假如我成為一獨裁者，便將和中國歷史上的許多獨裁者得其命運，在我死後四十八小時之內，人民便將把我忘乾淨了。假使我忠實。以政權還給人民，人民將永遠忘不了我，以中國的喬治，華盛頓視我。」

對於蔣總統的期望

譯自密勒氏評論報第一〇九卷第十期

朱·W·Hue
譯

何去何從，孰取孰舍，我還有什麼要躊躇的呢？

四月十二日，是一個可紀念的日子，全國懸旗慶祝蔣委員長當選中國第一任憲政大總統。我們在同聲慶祝之下，有不能已於言者，就是在這個時候，新總統受人民付託之重，其實任自然比以前越發的重大了。今日正是總統旋轉乾坤之時。亦是一個最難得的機會，他可以從此將中國治好。

我們不想做一個心理學家，去理解現在多數中國人的心理。不過我們可以知道，多數愛國的中國人與智識分子，他們的心中自然會發生許多問題，如：蔣委員長當選總統後，將做些什麼事呢？總統會不會根據國民大會決定的憲法，補充條款，運用其非常時期的權力，而為中國的獨裁者？總統將領導人民走「民主之路」麼？總統是不是將造成某種機會，以恢復國內的和平呢？中國的內戰，究竟要到什麼時候可以結束？

以上這些問題，都要待第一任的憲政總統來答覆，這種答覆，不是發表長篇大論的宣言所可濟事，是需要以事實來答覆的。國民大會通過的動員戡亂時期條款，使總統的權力大形擴大，原文如下：「總統在動員戡亂時期，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為緊急處分，」不必先經立法院立法程序之限制。

我們在此記起一件事，就是蔣委員長在重慶的時候，曾與當時美國的駐華大使赫爾將軍有一席談話，當時的委員長，就是現在的總統，據云說過這樣的話：「假如我成為一獨裁者，便將和中國歷史上的許多獨裁者得其命運，在我死後四十八小時之內，人民便將把我忘乾淨了。假使我忠實。以政權還給人民，人民將永遠忘不了我，以中國的喬治，華盛頓視我。」

一、有一位在各黨各派之上的領袖；

二、有一位強有力的民主的行政首長，

三、有一個代議機關。

以此三者聯合起來，中國所希望的政治體制，可以說明之如下：

一位超越各黨各派的領袖指導之下，置一

，那就是權勢與和解的結合，那麼世界的未來不是文明粉碎，就是戰爭蔓延，而且這次戰爭恐怕要包括一切的更殘忍和更不易預操勝算。戰爭不能再發生了，只要美國的人民放棄上和經濟上的和解，那些以為一切的和解就是妥協的人也要反對，不過，要使敵對的糾紛終止，不用權勢與和解雙管齊下，恐怕不易辦到。倘使我們不願或不能用傳統式的外交方針

，也不能達到理想的融洽，也不能去除美蘇之間所有的意見和糾紛，可是冷戰可以因此而結束，世界各國都可以從第二次大戰中恢復過來，各國亦可以締結和約而撤退駐歐的佔領軍，更可以使歐洲從歐洲人的手復興過來，這並不是容易做到的，牠需用權勢，那些反對利用強權政治的就要反對。牠又需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和解，那些以為一切的和解就是妥協的人也要反對，不過，要使敵對的糾紛終止，不用權勢與和解雙管齊下，恐怕不易辦到。以往錯誤和矛盾的觀念，戰爭或許不再會發生，我們不能假說與蘇聯的關係，不是永久的和平就是戰爭而使世界毀滅。我們的目的是和蘇聯作必要的通商，非常冷靜和機敏的，不要恐懼，也不要把過大的希望，盡量利用最大的公正態度，雖然現在世界上的公正並沒有一致的最高原則；並且各國間敵對亦並沒有相同的道德觀念。

強有力的而且是民主的行政首長，能以執行國家的政策與法律，保護人民的利益與幸福，同時人民亦有力量，行使其主權，以支配政府。這是在中國今日過渡時期最適宜的政治體制，在這個混亂與艱難的時期，祇有如此，方能得救。中國這個國家，並不需要獨裁，但是中國的人民，却希望總統如蔣氏者，能成為一位超越各黨各派之上的領袖。

這樣的領袖當然不是獨裁者。我們第一個希望，就是這位第一任憲政總統，應該趕快成立這樣一個政府，給人民以適當的機會。行使其主權，控制其政府。蔣總統應該看到這一點，應該看到他是國家的元首，要辭去國民黨的總裁地位，而成為一位超越各黨各派的領袖，不再參加黨派的工作，應該為一切黨派糾紛的調解人。

我們第二個希望，是中國剛剛步入「憲政時期」，開始的第一步，千萬不可走錯了路。所以我們希望蔣總統能以使人民都了解「憲政道德」的重要，得以充分應用才好。所謂「憲政道德」的原則，就是「少數的服從，多數的寬容，政治鬥爭遵守好的運動員精神」。不論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國青年黨，民主黨，以及其他所有黨派，均應遵守這種道德。如果中國政治家的心中，當此開始行憲的時候，沒有這種偉大的「憲政道德」觀念，那末，中國將來就不能有和平，不能有統一，中國的政治也將永遠不能走入正軌。

我們第三個希望，就是沒有一種憲法是能完全包括一切的，因此需要隨時補充。英國有好幾世紀沿用一種不成文的憲法。中國在今日這種情況之下，蔣總統自然可以創造許多好的憲政先例。這種先例自然會記錄在中國憲政史上的，而成為中國的不成文的憲法，與成文的憲法有同樣的重要。

這方面第一個憲政先例，就是蔣總統應該拒絕使用非常權力，拒絕引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我們第四個希望，就是一位強有力的而且是民主的行政首長，為了表示對民主政治的信仰，為了促進憲政的發展，應該尊重輿論，同時還應該密切的接近人民。他應該尊重人民的神聖權利，不是幾個少數「要人」，也不是少數的富人，更不是若干有權力的人，而是國內的一般「普通人」。

他不但要尊重輿論，並且應該以各種方法扶植輿論的成長。他應該以保障人民的自由與安全為其惟一義務。

我們第五個希望，在中國現狀之下，第一任憲政總統就任之後，他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成立一個在中國歷史上最强有力的內閣，掃蕩國家的動亂，這內閣就是行政院，參加者，必須為有知能之士，必須為「有國家觀念之人」，必須為真尊重人民而為人民所信賴之人，而不必論其黨派關係如何。

總統應以嚴厲手段，廓清官場中之貪污以及裙帶之風，其左右應多任才智之士。現在僅有台灣省政府的主席魏道明為文人，其餘全國各省主席，盡是軍人。現在應該請軍人解去文官職務，使「二十世紀的人士」來接替他們。同時蔣總統應該成立一個問團，動員國內的經濟專家與「社會化學家」來研究今天這樣的嚴重的經濟、土地、與社會問題，尋求其解決方案。總統並應領導人民，以迎新時代之到來。

質言之，第一任憲政總統，應為一強有力的而且是民主的行政首長，他應有充分力量，採取嚴峻方法，制裁貪污與犯法的官吏，投機與圓滑的商人，反動分子，軍閥，惡棍，不論其屬於任何組織，均須一律剷除。同時總統對人民應該是民主的；應該接近人民，了解人民，與人民談話，明白人民疾苦，和人民公開討行政。中國今天就需要這樣一位領袖。我們希望他進一步領導我們走入「民主之路」。

目前的世界問題，誰都知道是：「明天的世界，究竟是左傾呢？還是右傾呢？」我們當然不必走此左右兩極端，我們自有中間路線可走。因此總統就職之日，應該聲明中國所採取的是中間路線。蔣總統有此成竹在胸，就可以決定中國的內政與外交的政策。

至此又想起美國故總統羅斯福與一新聞記者的談話。這位新聞記者問羅斯福總統說：「總統先生，你是一位共產主義者麼？」我也不信仰共產主義。」然則你是一位資本主義者麼？」

「我並不信仰資本主義。」於是這位年輕的新聞記者又問：「那麼，你是一位社會主義者麼？」

「我也不信仰資本主義。」

相信的學說，究竟是什麼呢？」

「什麼學說？」羅斯福總統反問他，遲疑了一回，然後接着說：「我是一位基督教徒，又是一位民主論者。」

我們以為中國的領袖也應該有這樣的態度。

「不應偏向任何一主義，也應該拒絕做任何一派的信徒」，而專心致意為中國人民的幸福努力。

中國無疑的需要有一位領袖，需要一位成事的領袖，需要一位超越各黨各派的領袖，需要一位與故羅斯福總統有同樣才幹的領袖，以領導中國脫出現在的動亂。

假使我們以美國新聞記者問故羅斯福總統的問題，去問中國的第一任憲政總統，我們希望他給我們以同樣的答復。問到「什麼是你的學說」的問題，他的答覆應該是：「全體人民之政治的自由，經濟的平等，以及社會的安全。

總之，大總統蔣介石是我們的領袖無疑，而且是這個時候「惟一的」領袖，他能領導我們進一步領導我們走入「民主之路」。我們希望的